論　　著

# 運動、殖民與性別：近代上海英式狩獵活動中的女性*

張　　寧**

## 摘　　要

本文以帝國邊緣的上海為案例，結合運動與殖民、運動與性別兩個主題，同時討論殖民社會中的華洋女性，觀察她們如何利用運動此一概念，突破體能、心理以及社會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運動與殖民：近代外人在華的英式運動：（I）獵紙、（II）划船、（III）足球」(NSC 102-2410-H-001-025-MY3)的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2017年7月11-1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學術研討會。除會中曾給予指正的學者外，本人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他們不僅詳閱斧正，更提出許多具挑戰性的問題，迫使作者更深刻地思考本文的論述，特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對她們的制約，從而大幅擴大其公共空間。

受到英國傳統狩獵文化的影響，英式運動中，與馬匹、獵犬、獵槍有關者往往被放在較高位置，本文因此以賽馬、獵紙、賽狗三項活動為切入點。本文主張，殖民社會提供中上層女性難得的社會裂隙，一方面，英國母國森嚴的階級制度在此地被暫時性地打破與重塑，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階序也在此出現重新排列的機會。在這個更為自由的環境裡，跑馬場與賽狗場是滬上中上層女性發光的舞台，她們不只是觀眾，也是舉足輕重的賽馬馬主與賽狗主人，甚至是在曠野中跳躍奔馳的獵者。每當其勝出，她們的照片、名字刊登在中英文報刊與雜誌之上，光明正大，無須顧忌。通商口岸的社會裂隙提供女性前所未有的機會，而中上層女性也把握了此一機會，從父兄夫婿的背後走出，一舉顛覆了運動為男性領域的傳統，並大幅擴大了其公共生活的空間。

關鍵詞：運動、性別、殖民社會、上海

運動涉及階級、殖民、性別、身體等多項議題，在近代社會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便將運動與身份地位相連，他主張運動並非僅爲鍛鍊身體，選擇從事某項運動其實是維持並重塑社會階級的重要手段。[1] 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與其學生丹寧(Eric Dunning)藉「文明化歷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理論

1 Pierre Bourdieu,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6 (1978), pp. 819-840.

檢視英國足球迷的鬥毆現象時，也強調近世歐洲經歷數世紀的教化，才演變成今日處處要求自制、事事講求禮節的國度，但其人民對中世紀的血腥、暴力其實依然有著潛在追求，這種追求只有在足球比賽時，才能藉著驟然而起的暴動與失序得到暫時的宣洩。[2]

在運動所涉及的多項議題裡，運動與殖民的關係無疑最值得深入研究。緣因十八、十九世紀西歐向外擴張，不僅開啓全球社會、文化、制度的一致化，也將原存於一國一地的運動，帶至世界各地。今日通行各國的球戲，無一不源自歐美殖民遺跡，其中尤以英國的影響最爲明顯。殖民者一方面利用運動來推廣其儀節規範、行爲準則，一方面也藉此展示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陽剛，藉以與被殖民者的落後與陰柔作一對比。運動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到了後殖民時期，許多國家雖已脫離殖民母國獨立，卻仍擁抱這些殖民者帶來的球戲，視之爲「國球」，甚至在競賽場上，轉而與原殖民國競爭，棒球、足球、板球便爲其中的佼佼者。目前討論運動與殖民的研究雖多，但大多集中在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亦即所謂的正式帝國，[3] 對於英式運動在其他地區的情

2 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3 譬如，J.A. Mangan 分析帝國如何藉英式運動中所蘊含的品格教育，培養殖民地畫一的領導階級與幹部；Patrick F. McDevitt 剖析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大英帝國與殖民地間的運動賽事，指出運動是帝國傳播母國價值觀、凝聚殖民地向心力的重要工具等。參見：J. A. Mangan,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Aspects of the Diffusion of an Ideal* (London: F. Cass, 1998); Patrick F. McDevitt, *May the Best Man Win: Sport,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880-193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形，特別是文化傳統深厚如中國者，學界目前仍一無所知。爲塡補此一空白，本文採取Jürgen Osterhammel「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概念，將英國在華租界視爲英國廣義帝國的一部份，[4] 並以帝國影響最爲明顯的上海爲案例，同時試圖結合運動與殖民、運動與性別兩個主題，跳脫男性的角度，改以殖民社會中的女性爲主角，觀察她們如何利用運動此一概念，突破體能、心理以及社會對她們的制約，從而獲得某種程度的增權(empowerment)。

除了討論運動、殖民與性別之間交互影響的複雜關係，本文的另一特色，在於同時討論上海殖民社會中的華洋女性。過去研究者雖然指出通商口岸華洋雜處，但多半討論華人者僅論華人，討論西人者僅論西人，將居於同一空間、同一時間點的女性視爲不相干的兩群人，不認爲她們會因爲性別相同而面對同樣的問題，或借用同一方法來爭取相同的公共空間。這當然是基於中西文化不同的假設，但本文認爲，殖民社會中西文化混雜的特殊性，提供了這種難得的可能，而英式運動在殖民社會中的特殊地位，更提供她們一合適的工具。

在中文世界中，「運動(sport)」其實是項模糊的概念，一方面經常與「體育」一詞混爲一談，一方面多以球類或田徑活動爲主。[5] 但在英語的語境、特別是英式英文的語境

---

4 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pp. 290-314.

5 有關在中文語境中「運動」與「體育」的混淆性，參見：湯志傑，〈體

裡，受早期僅貴族或鄉紳可以狩獵之故，凡是與馬匹、獵犬、槍枝相關的活動，均被認爲是不折不扣的「運動」，並往往被放在較高位置。殖民社會受母國影響，尤其如此。本文因此捨棄一般熟知的球類活動，改以賽馬(horse racing)、獵紙(paper hunting)、賽狗(greyhound racing)三項活動爲切入點。因同時分析華洋女性，雖明知中文「狩獵」與「運動」二詞不必然可以相互包涵或相互解釋，卻仍大膽地將狩獵活動作爲英式運動的代表。藉分析此三種活動，本文發現，對上海殖民社會的中上層女性而言，華洋分界並不如想像中的明顯，她們經常面對類似的性別制約，也採取相似的策略加以突破。本文主張，殖民社會提供這些女性難得的社會裂隙，母國森嚴的階級制度在此地被暫時性地打破與重塑，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階序也在此出現重新排列的機會。在這個更爲自由的環境裡，跑馬場與賽狗場是滬上中上層女性發光的舞臺，她們不只是觀眾，也是舉足輕重的賽馬馬主與賽狗主人，甚至是在曠野中跳躍奔馳的獵者。每當其勝出，她們的照片、名字刊登在中英文報刊與雜誌之上，光明正大，無須顧忌。通商口岸的社會裂隙提供女性前所未有的機會，而中上層女性也把握了此一機會，從父兄夫婿的背後走出，一舉顛覆了運動爲男性領域的傳統，並大幅擴大了其公共生活的空間。

本文共分六節，除第一節專門討論運動與殖民的關係以及第六節結語之外，各以四節分析女性在英式狩獵活動中的

---

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卷 47 期 1（2009 年 3 月），頁 1-126。

不同角色，包括觀眾（第二節）、騎者（第三節）、馬主（第四節）及獵犬主人（第五節），其目的在說明在殖民社會的架構下，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導的運動領域中獲得增權。本文起迄時間約始自 1848 年上海第一次開始賽馬，至 1945 年上海跑馬廳關閉為止。在這段時間裡，除了最後兩年租界被中國政府收回，其他均為租界、華界並立的狀況。租界雖非殖民地，卻提供了與殖民地相似的基礎設施與管理，並由此形成華洋混雜的文化與價值觀，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女性才得以利用殖民社會最看重的狩獵活動，突破社會在體能、公共空間、乃至婚姻等方面的束縛，進一步獲得更多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主導權。

## 一、賽馬與殖民

賽馬可能是大英帝國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文化輸出，隨著殖民的腳步，英人每到一處，便大費周章地設立跑道，舖設草皮，舉行賽馬。根據英籍作家Austin Coates研究，在華最早的英式賽馬發生在 1798 至 1799 年的澳門。當時無論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或進行「港腳貿易」的散商，貿易期間均困在廣州十三行內，地既偪促又無家人陪伴，貿易季一過便急忙退居澳門稍事喘息，同時舉行賽馬藉此娛樂。馬匹則以葡萄牙人自菲律賓、婆羅州等地取得的馬尼拉小馬湊合。由於這是單調生活中的少數點綴，每逢賽事，外人社群無不盛裝以赴。[6]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外

[6] Austin Coates, *China Ra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 10-11. 此書為 1983 年香港賽馬會為紀念其成立一百年週

人活動不必再侷限於廣州或澳門，可以北上通商與居留。拜過去一百多年來英人在亞洲貿易與軍事上的主導與優勢，此時英式社交已成爲在華外人共同奉行的圭臬，賽馬也成爲凝聚社群向心力的年度大事。[7] 隨著通商口岸一一開闢，只要租界事務粗定，外人社群便尋覓場地，舉行賽馬。1842 年秋，廈門英軍開始在鼓浪嶼賽馬，1848 年春，上海也舉行首次馬賽。等到《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增開通商商埠，賽馬活動更陸續擴至天津（1863 年）、牛莊（營口）（1863 年 9 月）、北京（1863 年 12 月）、漢口（1864 年）、九江（1864 年）、寧波（1864 年 5 月）、芝罘（煙臺）（1864 年 5 月）、福州（1868 年 1 月）等商埠。[8]

通商口岸一開始的馬賽多半因陋就簡，以 1850 年上海的秋賽爲例，賽事只有一天，項目不過七項，同時馬匹狀況不斷，不是拒絕出發便是中途逃逸，[9] 而人數不多的外人仍興高采烈，比較「像是一個大型野餐會」而非正式的比賽。[10]

---

年，特別委託 Austin Coates 而作。該書雖非學術著作，內容也不完全正確，但因其獲准使用香港馬會所藏內部圖書資料，至今仍是瞭解賽馬在中國各通商口岸擴散情形的重要著作。以下本文引用主要為該書 1994 年二版。

7 Coates, *China Races*, p. 13.

8 Coates, *China Races*, pp. 14, 27, 38, 49, 54, 58, 62, 80, 86. 其中芝罘因氣候宜人，很快便成為英國駐華海軍的避暑勝地，每年英軍軍艦多安排在賽季時到達，加上天津一帶前來共襄盛舉的馬主，是以該地外人社群人數雖寡，僅一兩百人，但仍為華北英式賽馬的重要基地之一。參見：Coates, *China Races*, p. 82；〈烟臺雜事〉，《申報》，1889 年 10 月 21 日，第 2 版；〈福海潮音〉，《申報》，1895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烟海風帆〉，《申報》，1901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9 "Shanghae Races," *North China Herald* (hereafter *NCH*), 30 November. 1850, p. 70.

10 George Lann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但在首度賽馬之後，爲使該項活動能持續進行，各通商口岸的外人社群莫不竭心盡力，籌設規劃。由於英式賽馬以速度爲主，爲便於觀看，需要橢圓形而非直條型的寬闊場地，而未擴界前的租界狹小不便，必須在租界外圍取得土地，各通商口岸的外人社群因此排除萬難，買地整地，然後大費周章地設立馬廄、搭建看臺，進而籌集資金、成立賽馬會，以定期安排賽事。有時因水患、沙塵毀壞場地，或地價日增必須換地，還得一再遷徙，直至場地固定。[11] 這些均爲曠日廢時之事，在土地取得方面更容易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但整個社群同心一致，究其如此熱衷之因，除了休閒娛樂外，大抵有以下幾點。首先，跑馬可視爲殖民社會對更高階層生活方式的模仿。養馬、騎馬在英國國內極爲昂貴，只有貴族鄉紳才負擔得起，而來華英人多半來自中產階級下層、甚至勞工階級，在國內少有機會接觸此項運動，但是來華之後，他們的社會地位因租界的半殖民地性質而往上提升，自然對更高階層的生活方式產生模仿之意，加上蒙古馬在中國價格相對便宜，連一般洋行職員都負擔得起，養馬、騎馬便成爲抵華新手最熱衷嘗試的運動。

除了對更高階層生活方式的模仿，跑馬也有助於轉移租界年輕成員的注意力，從而維持草創時期殖民社會的秩序。

---

1921), p. 431.

11 這尤以天津、上海最為明顯，前者跑馬場地因水患與沙塵多次遷徙，直至 1887 年才在津海關稅務司德璀林(Gustav Detring)的協助下，在德氏自宅「養牲園」旁固定下來；後者也因租界土地增值而兩次換地。參見：Coates, *China Races*, pp. 47-48, 91-93; 徐葆潤，〈跑馬廳掠奪國人土地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舊上海的房地產經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169-178。

早期殖民社會以年輕男性爲主，男女比例懸殊，因此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生活可以寂寞、單調二詞形容。以人數最多的上海爲例，1850 年它剛開始舉行賽馬時，157 名外人中僅 28 位攜有家眷，男性佔總人口的 85%。[12] 到了 1880 年，租界規模粗定，上海外人人口增加至兩千多名，其中半數左右爲英籍，其他則依序爲美、德、法、荷等國。[13] 在此一千餘名的英籍人口中，男性比例高達 72%，十年之後，此數據下降至 62%，進入二十世紀更因總人數的增加而漸趨平衡，但直至 1935 年，上海英人社群在人口比例上始終處於男多女少的情況，尤其以十九世紀最爲嚴重。[14] 數千名血氣方剛又國籍不一的年輕男性擠在狹窄的租界空間裡，爲避免發生鬥毆、酗酒、賭博，甚至沈迷當地女子之類的事情，租界領導人莫不鼓勵他們從事激烈運動，以轉移其注意力，從而維持其身體與心靈的健康。

因此，上海跑馬總會(Shanghai Race Club)與教會、萬國商團、互濟會以及其他運動或社交型社團同爲租界生活的重要支柱，共同維繫殖民社會於不墜，此尤以租界建立初期爲然。等到租界基礎穩固，跑馬總會也演變成殖民社會內部身份地位的象徵，一旦成爲會員，不僅可佩帶襟章，在馬場通行無阻，比賽時還可坐在專屬看臺，觀賞騎師羣起揮鞭直線衝刺的場面。如果自己馬房的駿馬奪得勝利，身爲馬主，有

---

12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1850," *NCH*, 3 August 1850, p. 1.

1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舊海關史料》，冊 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頁 669。

14 Table 2 in Robert A. Bickers, "Shanghailand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159 (May 1998), p. 177.

權牽著馬匹從跑道經過看臺，接受觀眾的鼓掌喝采，這更是財富難以買得的榮耀。是以躋身跑馬總會、甚至出任董事，便成為殖民社會位階的重要指標，其難度僅次於工部局董事與上海總會成員。[15]

跑馬總會既然在殖民社會中有如此重要性，到了二十世紀初，耳濡目染下，一批長期與外人往來的華人，開始對跑馬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們不僅自己養馬、騎馬，更希望加入上海跑馬總會，接受和洋人馬主一般的對待。但跑馬總會是一個封閉型的俱樂部，不對華人開放。受挫之餘，這些華人遂於 1910 年自行建立萬國體育會(International Recreation Club)，以華洋兼收的方式招募會員，1926 年又以純粹華人為號召，成立「上海中國賽馬會(Chinese Jockey Club of Shanghai)」，從此華人男性開始有更多機會可以參與英式賽馬。檢視這兩個馬會成員的背景，萬國體育會的成員多出身於買辦家庭或清末洋務官宦之後，是殖民社會中的華人菁英；中國賽馬會則以新興的中產階級上層，特別是金融業者居多數，藉著中匯銀行一躍而為金融業龍頭的杜月笙即為其中的佼佼者。藉著華商賽馬會與英式賽馬，他們建立起與西人交往的平臺，同時也重新塑造了自己在通商口岸中的階級地位。[16]

---

15 有關上海跑馬總會的詳細情形，參見：張寧，〈總會、運動與殖民：清末民初之上海跑馬總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15 年 11 月 14 日。

16 有關萬國體育會與中國賽馬會的創立以及華人加入賽馬的情形，詳見：張寧，〈建一個自己的總會：上海萬國體育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跨區域與跨文化的接遇」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2 日；張寧，〈從萬國到中國：近代上海的中國賽馬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17 年 11 月 30 日。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無論是上海跑馬總會、萬國體育會，還是後來成立的中國賽馬會，均屬於紳士型總會(gentleman's club)，這類的英式俱樂部以高度排他性為其特徵，凡欲成為會員者，均須經過嚴格的入會審查，其過程一般包括提名、展示、投票三個階段。首先申請者必須先取得兩名會員支持，一人負責提名，一人同意連署，然後將姓名、職業、地址等基本資料送入，在馬會的大看臺上公開展示，好讓會員有機會討論與過目，三個月之後才由選舉委員會進行投票表決。至於多少才算通過，各總會略有出入，以上海跑馬總會為例，1930 年的記票方式是 20 名選舉委員中必須有 11 名投票才算有效，其中如果出現三張反對票，便算否決。[17] 藉著如此嚴格的入會審查，上述運動型總會不僅排除與自己階級不同的男性，也排除與自己性別不同的女性，是以高大會所、喝酒飲宴、聊天打牌、品評時勢，均無女性蹤跡，賽場上的揚鞭策馬、一較長短，更是男性的專利。

## 二、看與被看

運動作為一男性專屬的領域，女性最初僅能扮演觀眾的角色。她既不被允許上馬馳騁，也不能擁有馬匹、出任馬主，但是女性很快便發現這個觀眾的角色具有特殊優勢。緣因英式賽馬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已發展成一種「觀眾性運動(spectator sports)」，亦即觀眾的觀看是造成賽事刺激有趣的主要因素，而殖民社會中的男女比例懸殊，大幅提高了女性

[17] *Rules of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Shanghai: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pp. 8-12.

觀眾的重要性，女性前來觀賽被在場男性視若拱璧。檢視十九世紀末《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有關賽事的報導，首先討論的必定是天氣，因爲當天是晴是雨，關係著跑道狀況與馬匹表現，是冷是暖則關係著當天會有多少淑女前來觀賽。由於跑馬場多半離租界有段距離，加上場上風大沙大，只要天氣不對，下雨或太冷，淑女們經常不願大駕光臨。而對租界男性成員而言，任何女性的出現都被視爲蓬篳生輝。例如，1873 年上海秋賽第一日天氣奇特，太陽雖露臉，但寒風刺骨，所以看臺有陽光的一邊像夏天，而沒陽光的一邊則宛如冬日，出席的女性自然都在有陽光的那頭，《北華捷報》指出這些淑女是應賽馬會董事之邀前來，同時不忘添上一筆「她們的出席，使得原有的陽光更加燦爛。」[18] 1878 年上海春賽的第一日天氣和暖，由於春日宜人，女性觀賽人數居然超過平常的十幾位，女士的到來「立刻爲會場增添了顏色，使原先常有的沈悶之感一掃而空。」[19] 大抵每年賽事，凡是有女士大駕光臨，其描述不是「景色爲之一亮」，[20] 便是爲賽事「增添了色彩與活力」，[21] 有時更直言「女士的出現大大地帶動了賽事的氣氛與樂趣」。[22] 女性出席人數如此重要，以至《北華捷報》認爲一個好的賽馬日應包括三項條件，女性的賞光、晴朗的天氣，以及激烈的賽事，而淑女露

18 "Shanghai Races," *NCH*, 6 November 1873, p. 393.

19 "Shanghai Spring Races," *NCH*, 4 May 1878, p. 457.

20 "The Shanghai Autumn Meeting," *NCH*, 12 November 1902, p. 1014.

21 "The Shanghai Autumn Race Meeting, 1904," *NCH*, 4 November 1904, p. 1052.

22 "Tientsin Spring Race Meeting, 1895," *NCH*, 31 May 1895, p .826.

面的重要性尤居三者之先。[23]

女性的出席無疑提高了騎師與馬主的士氣，而淑女願意冒著風沙前來，自然也有自身的打算，她們不僅前來「觀賽」，也來「被看」。春秋兩季賽馬是外人社群的重要大事，外人群集，對仕女而言，這是展示身材與品味的最佳舞臺，爲了這個難得的社交場合，她們事先裁製了新裝，備足行頭，只待天氣適宜，便可大方展示。[24] 而春、秋兩季相較，春賽尤爲展示新裝的好機會，因爲可以藉此脫下厚重的冬衣，展現剪裁合宜的春裝，以及配套的時尚鞋帽。譬如，1896年上海春賽天氣稍熱，但幸有雲朵遮掩陽光，大批淑女身著新裝聚集於看臺前的草坪之上，爲賽事增添迷人氣氛。[25] 1905 年上海春賽第三日，天氣和暖舒適，在上下半場之間用過午餐後，女士們穿著「極盡炫麗的春裝」魚貫走出帳棚，在馬廄圍場與看臺間漫步，形成一片如詩如畫的景象。[26]

不僅女士有意識地展示色彩與美感，男士也對「所看」之物有所期待。他們在春賽中期待看到美麗的臉龐與漂亮的洋裝，[27] 在秋賽中期望看到亮麗的皮毛與裝飾。[28] 1888 年上海春賽天氣不佳，陰雨連綿，女士原先準備好的新裝只能延遲推出，令觀者大失所望。[29] 1890 年上海春賽首日天氣一開始頗爲陰霾，令人擔憂，但後來東南風吹起，陽光露臉，

23 “Tientsin Races: Spring Meeting, 1887,” *NCH*, 20 May 1887, p. 552.

24 “Tientsin Spring Race Meeting, 1894,” *NCH*, 25 May 1894, p. 814.

25 “Shanghai Spring Meeting, 1896,” *NCH*, 8 May 1896, p. 723.

26 “The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NCH*, 5 May 1905, p. 259.

27 “Shanghai Race Club: Spring Races 1910,” *NCH*, 6 May 1910, p. 317.

28 “The Shanghai Autumn Race Meeting, 1904,” *NCH*, 4 November 1904, p. 1052.

29 “Shanghai Spring Meeting, 1888,” *NCH*, 4 May 1888, p. 500.

不過前來觀賽的女士因擔心天氣不佳，所以沒有穿上大家所期待的時新春裝，女士們表示第二日如果天氣依舊晴朗，將集體展現時尚，大家可準備好觀看「炫目大秀(a blaze of splendour)」。可惜第二天烏雲壓頂，氣溫下降，比較適合保暖衣物而非單薄春衫，大家原先期待的時裝表演遂因此無疾而終。[30]

除了一般的時裝展示外，對女性而言，還有一個特殊的機會，可以成爲全場焦點。爲了增加賽事的可觀性，賽馬會除極力邀請租界仕女出席外，同時也費盡心思地在賽事中安排了一項「淑女銀袋賽(Ladies' Purse)」，其特殊處在於獎金募自租界仕女，多以英鎊而非一般的銀兩計，同時獲獎者爲跑得頭馬的騎師，而非馬主。爲了讓女士贊助此事，賽馬會事前多在其成員中找一位年輕英俊者挨家挨戶地拜訪租界淑女，請求資助，譬如「瓊斯夫人，不知能否請您慷慨解囊兩英鎊？」[31] 募得的金幣裝入一個編織的錢袋裡，由一位女士代表親自頒發，其金額一般從二十到四十英鎊不等。[32] 錢袋多半造型簡單，由仕女手織，但有時淑女們會發揮創意，做意想不到的變化，譬如 1878 年上海春賽的銀袋便被安置於馬銜狀的座子上，並用參賽馬廄顏色的彩帶予以裝飾，外面再罩上玻璃罩子。[33] 不論其造型簡單還是複雜，開賽前多半被事先展示，以上述 1878 年上海春賽爲例，看臺上除了

---

30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NCH*, 2 May 1890, pp. 536, 537.

31 John L. Anderson, "Our Horse Races in China," *Outing*, vol. XVI, no. 5 (August 1890), p. 368.

32 "Shanghai Races," *NCH*, 3 May 1873, p. 380; "Shanghai Spring Races," *NCH*, 4 May 1878, p. 461.

33 "Shanghai Spring Races," *NCH*, 4 May 1878, p. 458.

精心設計的鮮花與盆景外，馬銜狀的淑女銀袋便被安排在中心位置，與一旁的輪船招商局捐贈的招商盃，相互輝映。[34]

賽馬是男性的專屬領域，「淑女銀袋賽」是陽剛氣中少數含有「英雄美人」意涵的賽事，觀者莫不引頸期盼，看「袋」落誰家。每逢頒獎典禮往往吸引大批的男性觀者圍聚四周，熱切觀看，並不忘歡呼起鬨。例如，1886 年上海春賽的得獎者是任職工部局的雷諾(S. Reynell)，他是當時著名騎師與板球選手，在上海運動界極受歡迎，雷諾策馬剛過終點時便獲得大家的歡呼，然後從他至秤重間秤重，一路到大看臺領獎，鼓掌歡呼聲不絕於耳，直至淑女致詞。[35]

淑女致詞時多半靦腆簡短，有時因樂隊聲音過大而無法聽清，[36] 但也有些淑女較為能言善道，譬如 1888 年上海春賽的頒獎代表貝爾小姐(Miss Bell)，她致詞時先表示很榮幸受賽馬會之託頒此獎項，為了不再重複大家已經耳熟能詳有關強壯、勇敢、成功等頌詞，她將指出租界淑女很樂意參與跑馬這項運動，在未來也將繼續支持，在此她謹以這個小小的錢袋表達租界淑女對騎師努力的理解與感謝。[37] 淑女致詞是展現口才與機智的良機，有些淑女別出心裁地附上一首小詩，[38] 也有淑女全數用韻文的方式致詞，[39] 更有淑女不忘語帶幽默，譬如 1886 年上海春賽的頒獎人韓桑小姐(Miss Hanson)，她先代表租界淑女盛讚得獎騎師的技巧與騎術，

---

34 “Shanghai Spring Races,” *NCH*, 4 May 1878, p. 458.

35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1886,” *NCH*, 7 May 1886, p. 483.

36 “Shanghai Spring Races Meeting,” *NCH*, 2 May 1884, p. 505.

37 “Shanghai Spring Meeting, 1888,” *NCH*, 4 May 1888, p. 502.

38 “Shanghai Spring Races,” *NCH*, 6 May 1879, p. 447.

39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1894,”*NCH*, 4 May 1894, p. 690.

然後加上一句「我將不再耽擱你的時間，因為我相信你會同意，不論在家裡還是在跑馬場的大看臺上，女士的演說都應該越短越好。」[40]

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淑女銀袋賽」進入二十世紀後開始由盛轉衰。早期外人人數不過數千，人與人之間大體認識，舉行馬賽時有如大型野餐會，但自 1905 年起，租界人數開始過萬，並日漸攀升，加上日、俄等非歐美籍人士陸續湧入，大幅沖淡原先以英式社交為主的社會生活。[41] 舉行賽事時，外人見面互不相識已為常事，「淑女銀袋賽」也因此失去原先加強社群向心力、鞏固社群意識的功能。可能是基於此一原因，從 1902 年開始，此一歷史悠久的賽事即不再出現在上海跑馬總會的節目單之中。[42]

「淑女銀袋賽」雖在以英人為主導的上海跑馬總會中銷聲匿跡，卻由華人所主導的萬國體育會與中國賽馬會繼承。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入場觀賽的女性以西人為主，華人女性多選擇在場外遠眺。[43]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隨著 1910 年萬國體育會以及 1926 年中國賽馬會的相繼成立，華人女性開始有機會入場觀賽，並用兩種方式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一是延續上述的「淑女銀袋賽」，出任賽事的頒獎人；一是

---

40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1886," *NCH*, 7 May 1886, p. 483.

41 〈表 56〉，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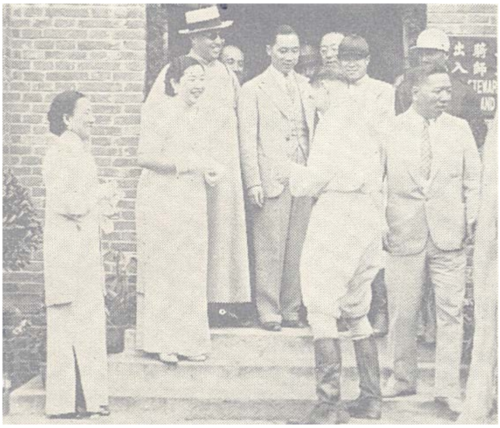
42 "The Shanghai Spring Meeting," *NCH*, 14 May 1902, pp. 957-965.

43 有關十九世紀末，賽馬場畔的臨時性公共空間，以及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看與被看的角色，詳見：Ning Jennifer Chang, "To See and Be Seen: Horse Racing in Shanghai, 1848-1945," in Toby Lincoln and Xu Tao eds., *The Habitable City in China: Urban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7), pp. 91-111.

父兄或丈夫勝出時，以眷屬的身份一同拉馬走過大看臺，接受眾人歡呼。

以 1936 年 6 月中國賽馬會常年大賽爲例，「淑女銀袋賽」被特別安排在第四天舉行，作爲壓軸。此時獎金已不再募自租界仕女，淑女也不再一針一線地編織銀袋，但是頒獎人依舊是淑女，且是位華人淑女。當時杜月笙正擔任中國賽馬會會長，因此頒獎人無他，正是杜的第三位夫人姚玉蘭。出身梨園世家，婚前走紅多年，大江南北見過不少世面，在重要場合應付裕如，又生得豐腴富泰，風光體面，加上一口清脆的京片子，正可補杜月笙一口浦東土話兼不擅言詞之不足，是擔任「淑女銀袋賽」頒獎人的不二人選。從專門報導
出身梨園世家，婚前走紅多年，大江南北見過不少世面，在重要場合應付裕如，又生得豐腴富泰，風光體面，加上一口清脆的京片子，正可補杜月笙一口浦東土話兼不擅言詞之不足，是擔任「淑女銀袋賽」頒獎人的不二人選。從專門報導
運動界情形的《競樂畫報》所刊的兩張照片（參見圖一、圖二），可看出當時杜夫人（圖一左二）身著白色絲綢旗袍，手戴西式白手套，耳帶珍珠耳環，裝扮入時，笑容滿面，即便面對西人騎師也毫無懼色。她先頒贈銀袋給「淑女銀袋賽」得獎騎師恩加那沙(Charlie Encarnacao)（圖一前排右二），並溫言恭賀；繼而代贈銀杯給「搖會馬競爭杯」得主海馬惟去(Victor Haimovitch)（圖二前排右一）。面對如此貴婦人，兩名騎師均略顯靦腆，周邊觀看的華人馬主與騎師則是止不住的笑容，整體氣氛輕鬆自在。

圖一　1936 年 6 月 7 日杜月笙夫人頒發中國賽馬會「淑女銀袋賽」之銀袋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競樂畫報》，卷 10 期 48（1936 年 6 月 13 日），頁 15。

圖二　1936 年 6 月 7 日杜月笙夫人頒發中國賽馬會之「搖會馬競爭杯」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競樂畫報》，卷 10 期 48（1936 年 6 月 13 日），頁 15。

除了以夫人身份擔任頒獎人之外，另一個更普遍的方式是當另一半勝出時與他一同、或者獨自拉馬走過大看臺，享受眾人目光，這正是有權勢的男性給予女性的最佳禮物。例如，出身白相人的高鑫寶（高懷德）隨杜月笙發跡後，毅然捨去法租界的煙土買賣，改在公共租界開設麗都花園舞廳，一方面以舞場老板的身份，結納名流、招待巨商，一方面出資成立麗都體育會，自任會長，一變而爲滬上足球運動的重要贊助者。[44] 此外，在公開場合，他也逐漸捨棄高鑫寶之名而不用，改以京劇《斬黃袍》中的北宋名將高懷德示人。爲提高身份地位，高懷德大約於 1934 年開始加入中國賽馬會，馬房名“Mr. King”，馬匹均以King爲名，如Cheerful King、Ideal King、King of Kings、Sporting King、Victory King等，在 1934 至 1937 年間屢屢勝出。[45] 每逢馬房奪冠，高懷德多讓其寵妾花情娟老六以高夫人的身份出面牽馬走過大看臺。從圖三 1935 年 12 月的這張勝出照片，可以看出花情娟老六嬌小玲瓏，身著長及腳踝的大衣，手持皮包、耳戴珍珠耳環，裝扮入時、風姿綽約。[46] 花情娟老六約在 1930 年左右歸高

---

44 簾外風，《上海大亨杜月笙續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頁 141-143；〈麗都花園明日開幕預誌〉，《申報》，1936 年 9 月 14 日，第 13 版。

45 “List of Winning Owners and Amount of Stakes won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zepoo during 1934,” *The Racing Record (Form at a Glance): A Complete Record of Racing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szepoo for 1934*, vol. XVII (Shanghai: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5), p. 136.

46 “Photos: Winners at the C.J.C. First Extra Meeting”，《競樂畫報》，卷 1 期 9（1935 年 12 月 24 日），頁 17。

懷德，兩人感情甚佳，共育有一子一女。[47] 高懷德對她雖寵愛有加，但在中國社會裡，除了物質生活之外，他很難再給她更多的身份或地位，所以高懷德選擇在賽馬場這個華洋雜處的世界裡，讓花情媚老六當高夫人，也是大馬房“Mr. King”唯一的另一半。

圖三　1935 年 12 月高懷德夫人拉馬走過引翔賽馬場大看臺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競樂畫報》，卷 1 期 9（1935 年 12 月 24 日），頁 17。

不管上場的是妻還是妾，既然隨時可能成爲眾人目光的焦點，女性便需做好準備，時時處於最佳狀態，衣著不可重複，裝扮更不可過時。這種看與被看的過程在 1930 年代之

47　妙人，〈金廷蓀痛哭高鑫寶〉，《晶報》，1940 年 3 月 20 日，第 4 版。

後，變得更加複雜。除了視線交流之外，還有照相鏡頭的加入，亦即不僅被在場眾人所觀看，這些風光的時刻，還可以被鏡頭捕捉，刊載畫報上，讓不在場者一同觀賞。甚至化身爲照片，掛在牆上，供人重複回味。爲了讓自己在鏡頭內外都同樣美麗，女性需要對「被看」這件事有更多的自覺。圖四 1944 年 10 月的一張李麗華代表張家老七張緒譜勝出後拉馬進場的照片，正可展現女性這種隨時隨地的準備。當時李麗華正在電影界中快速崛起，身爲張緒譜的另一半，她精心裝扮，頭戴太陽眼鏡，手拿皮包，腳穿高跟皮鞋，是位不折不扣的時尚美人。當手持望遠鏡的另一位馬主張家老四只知大步前行的同時，她卻確切地知道攝影者的位置，對鏡頭、也對觀眾綻放出甜美的笑顏。

圖四　1944 年 10 月 17 日李麗華（右）拉馬走過上海跑馬廳大看台

資料來源：《亂世風華：20 世紀 40 年代上海生活與娛樂的回憶》作者張緒諤先生提供。

藉著扮演領獎人或拉馬走過大看臺，女性闖入了純男性的賽馬世界，短暫地攫取了眾人的目光。不過，這些場合固然風光，那些掌聲與歡呼針對的並非女性本身的能力或成就，而是背後男性馬主的財富與權勢。女性並非不能馳騁，要如何才能在賽馬世界中獲得承認，而非總是陪襯。爲了達到此一夢想，一些滬上西人女性開始利用獵紙賽逐步闖入賽馬此一男性的禁區。

## 三、跳浜越澗

獵紙賽又名「跑紙」或「灑紙賽馬」，是英國獵狐活動(fox hunting)在海外的變型。英人來華後，亟望模仿國內上層階級的獵狐活動，但中國人煙稠密，沒有合適的狐狸可打，在華英人便發明一替代方法，改由一人擬扮成獵物，先行以灑紙的方式留下「獸跡」，譬如紫色碎紙代表需躍入溪澗、綠色碎紙代表可列隊過橋，後方大批隊伍再騎馬一擁而上，在田陌、溪澗、甚至墳堆間循線前進，以先達終點者爲勝。其活動範圍約在租界周圍 5 至 10 英哩，時間則在每年秋收後的 11 月至 3 月初。由於此一活動較賽馬更接近英國的狩獵文化，且不含賭博成分，外人社群普遍認爲這是一種「世上公認最善、最純淨之運動」，早在 1863 年即成立上海獵紙會(Shanghai Paper Hunt Club)，定期於冬日週六的午後舉賽。賽馬場既然一時不容許女性參與，獵紙賽遂成爲滬上西人女性第一個突破性別限制的窗口。

最早一批試圖闖入禁區者，是那些出身賽馬世家的女性，她們從小見父兄於冬日午後跳浜越澗，耳濡目染之下，

也想上場一決雌雄。不過，有兩個問題必須克服，一是獵紙賽雖非眞正的獵狐，但每次出獵時風沙滿臉、弄濕衣物，更有摔落馬背的危險，被認爲不是淑女該做之事；二是當時西方女性爲保持外觀上的優雅，也爲了符合社會規範，騎馬時多以側坐爲主，亦即垂直坐在馬背，雙腿一起放置在馬背左側，再上覆厚重長裙，這種姿勢僅靠左腳踏鐙，馬匹奔跑時很難維持身體的穩定度，更不用說騰空跳躍。所幸此時英國的一項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十九世紀下半葉，女性側鞍中第二犄角的發明，讓側騎的女性兩隻腿都可以固定與著力，如此女性可以穩坐馬鞍，身穿裙裝跳欄而無礙，既參與激烈的馬術活動，同時保有女性的優雅。拜此一技術的突破，英國中上層女性參與獵狐活動者日多，從原先僅有少數特立獨行的貴族情婦，逐步擴及體面的上層階級婦女，到了二十世紀初，甚至中產階級上層的女性也試圖加入。到了這個階段，除了優雅的側坐騎馬外，跨坐騎馬也逐漸被接受與允許。[48] 母國的情況爲滬上女性鋪平參與騎馬狩獵的道路，獵紙賽遂成爲她們最先在賽馬界證明自己的體力、能力與騎術之處。

由於獵紙限於冬季，獵紙會是滬上少數沒有會所的總會，每逢舉行常年大賽或會員大會，多假座上海跑馬廳舉行。該會對於會員審查也遠較跑馬總會鬆散，既不收入會費，年費也頗爲低廉，基本上只要愛好馳騁者均可加入。[49] 滬

---

48 Erica Munkwitz, “Vixens of Venery: Women, Sport, and Fox-Hunting in Britain, 1860-1914,” *Critical Survey*, 24: 1 (1 March 2012), pp. 74-87.

49 有關獵紙賽在殖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參見：張寧，〈跳溝越澗：獵紙賽與上海殖民社會〉，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史學科創新團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室

上男性在女性親屬的不斷要求下，既然一時無法讓女性參與賽馬，遂在獵紙賽中安排單場的淑女賽，以爲搪塞。目前可見最早的淑女獵紙賽在 1895 年舉行，當時還有許多獵紙會的男性會員不以爲然。[50] 到了 1910 年代末，特別是 1918 年之後，每季一到二次的淑女專屬賽事漸成定例，每次舉賽，不僅獵紙會會長親自安排路徑，獵紙會的男性董事更一路策馬相隨，以免妻女或姊妹在途中發生意外。[51] 在這樣的安排下，到了 1920 年代初，滬上已培養出十餘名擅長跳浜越澗的女性，她們既不怕風沙漫天，也無畏於溪水寒冷，在練騎時被座騎摔落以致受傷也當作是尋常事情。1924 年女性在屢次要求混合比賽不成後，進一步成立一專供女性會員的「上海淑女獵紙會(Shanghai Lady's Paper Club)」，[52] 其頭兩任會長希克林夫人(Mrs. N.W. Hickling)、可子小姐(Miss Coutts)，正是這樣全心愛好運動的女性。

希克林夫人出身於賽馬世家，其背景很能代表第一批闖入滬上賽馬禁區的女性。她閨名妮娜・強斯東(Nina McKie Johnstone)，是怡和洋行大班約翰斯東(John Johnstone, 1881-1935)之妹，也是該洋行創辦人渣甸(William Jardine)姊姊的曾孫。怡和洋行向來內舉不避親，凡創辦人的直系或旁系親屬均歡迎加入，只是必須從基層做起，證明自己的能力之後才能升任大班，約翰斯東即爲其中之一。1902 年約翰斯東自伊頓公學畢業後，即加入怡和洋行香港總部，自職員做起，

主辦，「外僑與近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1 月 29-30 日。

50 "Sporting Notes,"*NCH*, 11 January 1895, pp. 56-57.

51 "Paper Hunt Club: The Ladies' Hunt," *NCH*, 3 February 1923, p. 321.

52 "Paper Hunt Club for Ladies," *NCH*, 26 January 1924, p. 130.

1908 年被派至上海，1915 年成爲駐滬大班。約翰斯東在華期間，還是小姐的希克林夫人據說曾前來探親，結識同在怡和洋行工作的希克林先生(N.W. Hickling)，1910 年 1 月兩人在蘇格蘭完婚，從此強斯東小姐成爲希克林夫人。[53] 約翰斯東是怡和洋行大班中最好騎術者，希克林先生同樣也是各式運動的佼佼者。驚人的是，與其兄長或丈夫相比，希克林夫人毫不遜色，無論是高爾夫球、草地網球，還是業餘話劇，她都樂此不疲。[54] 不過，騎馬還是她的最愛，她擅長側坐跳欄，是滬上著名的淑女騎師。雖幾次因快意馳騁而墜馬受傷，仍不改其衷。[55] 在其推動下，淑女獵紙會於 1924 年正式成立，由其擔任首任會長，長達六年之久(1924、1925-1928、1930)。[56] 希克林夫人不僅活躍於運動界，也是上海社交界的著名人物，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曾參與滬上多項婦女組織，包括擔任兒童救濟聯盟(The Ministering Children's League)名譽秘書、婦女仁慈社(The Ladies' Benevolent Society)

---

53 "Obituaries and Funerals: Mr. John Johnstone," *NCH*, 20 March 1935, p. 462; "Hickling, Noel Wallace,"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5), p. 226; "Passengers: Inward," *NCH*, 6 May 1910, p. 346.

54 "'The Cabinet Minister' by A.W. Pinero," *NCH*, 24 April 1915, p. 253; "Ladies' Golf Club," *NCH*, 12 May 1917, p. 343; "Lawn Tennis," *The Shanghai Times*, 12 June 1918, p. 4.

55 "Accident to Master of Ladies' Hunt," *NCH*, 3 April 1926, p. 14.

56 "Photo: Mrs. N.W. Hickling," C. Noel Davis, *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 1863-1930*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0), between pp. 8 and 9; "Paper Hunt Club for Ladies," *NCH*, 26 January 1924, p. 130; "Ladies Paper Hunt Club," *NCH*, 22 November 1924, p. 320; "Photo: Mrs. N.W. Hickling," *The China Press*, 23 March 1930, p. B1.

名譽司庫、[57] 滬上菁英婦女所組成的英國婦女會(British Women's Association)執行委員等職。她與夫婿兩人，盛夏在威海衛避暑、釣鱸魚，[58] 冬日則並轡奔馳於上海近郊，可謂神仙眷屬。但風光的生涯在 1936 年突然告終，該年年底，時任眾業公所主席的希克林先生身體突感不適，病情隨即急轉直下，1937 年 1 月病逝上海。[59] 喪禮結束後不到兩個月，希克林夫人黯然返英。[60]

殖民社會中的女性一旦喪夫，如果沒有子女，遲則一年，短則數月，便必須離滬返回母國，希克林夫人便是一例；但是如果有子女，且子女幼小，再嫁就成了唯一的選擇。本節的第二位主角可子小姐的外婆伊莉莎白與母親佛羅倫斯便是如此。伊莉莎白閨名格蘭姆斯小姐(Miss Elizabeth Grimes)，1877 年 2 月從英國千里迢迢地來上海，嫁給在大英自來火房(Shanghai Gas Company)工作的羅傑森(J.M Rogerson)，兩人同為曼徹斯特人，婚後連續生下兩個女兒。羅傑森婚後工作順利，從職員升任副工程師，且積極參與萬國商團與規矩會等活動。但平順的生活維持不到八年，1885 年年底羅傑森突然過世，年僅 46 歲。[61] 羅傑森夫人帶著兩個幼女，不得不在 1889 年底嫁給恩迪科特(R. R. Endicott, 1855-1917)。[62] 恩迪科特是個美國人，早年在船上工作，後來到香港得忌利士洋

---

57 "Photo: Mrs. N.W. Hickling," *The China Press*, 23 March 1930, p. B1.

58 "Record Weihaiwei Bass Taken," *NCH*, 25 September 1935, p. 522.

59 "Obituary: Mr. N.W. Hickling," *NCH*, 13 January 1937, p. 65.

60 "Passengers for Southampton," *NCH*, 3 March 1937, p. 370.

61 "Deaths," *NCH*, 16 Decemter 1885, p. 669; "News of Summary," *NCH*, 16 December 1885, p. 670.

62 "Marriages," *NCH*, 6 December 1889, p. 681.

行(Douglas Lapraik& Co.)船務部任職，曾被派駐基隆多年。1887 年他離開得忌利士洋行，轉赴上海，加入老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 Co.)，兩年後娶羅傑森夫人爲妻。當時恩迪科特已 34 歲，新夫人比他年長兩歲，又帶著兩個拖油瓶，不過在男多女少的殖民社會裡，這對兩人而言，都是最好的婚配方式。婚後兩人又生了一個女兒，恩迪科特後來離開老沙遜，轉任股票經紀人，是上海眾業公所的創始會員之一，1917 年才過世，享年 62 歲。[63] 恩迪科特夫人的壽命更長，1922 年方撒手人寰，享年 70 歲。三個女兒長大後，分別嫁給殖民社會中有頭有臉的人物，長女佛羅倫斯先嫁股票經紀人歐文(P.W. Irvine)，再嫁外匯經紀商可子先生(G.D. Coutts)；次女嫁給天祥洋行的麥道南(R.G. Macdonald)；么女則嫁給美國領事官衛家立(C. L. L. Williams)。藉著聯姻，恩迪科特夫人成功地在上海建立起一個繁盛的家族，並從殖民社會的中下層，攀升至上層。她總共在滬四十五年，廣受喜愛，朋友眾多，1922 年當她過世時，《北華捷報》稱她爲「一位非常年長且廣受尊敬的上海居民」。[64]

可子小姐的母親便是恩迪科特夫人的長女佛羅倫斯，她閨名羅傑森小姐(Miss Florence Evelyn Rogerson)，1878 年生，[65] 21 歲時嫁給美國人歐文(P.W. Irvine)爲妻，[66] 婚後次

---

63 “Obituary: Mr. R.R. Endicott,” *NCH*, 14 July 1917, p. 95.

64 “Obituary: Mrs. Endicott,” *NCH*, 28 January 1922, p. 237; “Williams, Charles Louis Loos,” Carroll Lunt, comp., *The China Who’s Who 1927 (Foreign)* (Shanghai: 1927), p. 276.

65 “Births,” *NCH*, 27 April 1878, p. 421.

66 “Readings for the Week,” *NCH*, 10 April 1899, p. 604.

年即生下一女。[67] 歐文在滬上開設寶源洋行(Irvine, Edblad& Co.)，專營股票經紀與佣金代理業務，[68] 本來甚爲成功，但 1907 年開始捲入債務糾紛，[69] 1908 年匆匆離滬，[70] 從此不見蹤跡。1909 年佛羅倫斯帶著女兒改嫁可子，[71] 並將女兒的姓氏一併更改。婚後第二年佛羅倫斯即生下一子，年已 37 歲的可子先生欣喜之情，可以想見。[72] 第二段婚姻雖然美滿，但比第一段更爲短促，僅有八年光景，1917 年底佛羅倫斯以可子夫人的身份逝於上海，享年 40 歲。由於可子先生在證券界、賽馬界舉足輕重，喪禮冠蓋雲集，跑馬總會的董事、眾業公所的會員、各大銀行的負責人，還有恩迪科特家族的岳母、女兒、女婿均齊聚一堂，共表哀悼。[73]

可子小姐即爲可子先生的繼女，自小活潑好動，閨名雖是秀氣的葛麗絲(Miss Grace Mary Coutts)，卻有個男孩的外號——比利，整個外人社群都以「比利・可子(Miss "Billy" Coutts或Miss Billie Coutts)」小姐名之。可子家是滬上有名的賽馬世家，可子先生的父親庫茨先生(G.W. Coutts, 1833?-

67 "Births," *NCH*, 30 January 1900, p. 173.

68 "Irvine, Edblad& Co.,"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Shanghai: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01), pp. 29-30.

69 "U. S. Court for China: Zilz v. Irvine et al," *NCH*, 2 August 1907, p. 278; "U. S. Court for China: F. M. Brooks v. P. W. Irvine, C. W. Mead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NCH*, 9 August 1907, p. 346; "U. S. Court for China: F. M. Brooks v. P. W. Irvine, C. W. Mead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NCH*, 23 August 1907, pp. 449-450.

70 "U. S. Court for China: P.W. Irvine v. C.W. Mead," *NCH*, 1 August 1908, p. 309.

71 "Marriage: Coutts-Irvine," *NCH*, 27 November 1909, p. 498.

72 "Obituary: Mr. G.D. Coutts," *NCH*, 31 December 1926, p. 629.

73 "Death of Mrs. G. D. Coutts," *NCH*, 29 December 1917, p. 774.

1890)原爲屈臣氏大藥房合夥人，1851 年來滬，1870 年代成爲滬上重要馬主，馬房名「費爾南多先生(Mr. Fernando)」，庫茨常年擔任上海跑馬總會董事，並於 1881 與 1882 兩年獲選爲總董。[74] 可子先生子承父業，1900 年代先與另一馬主麥格雷革(Robert Macgregor)合夥，成立「複式(Duplex)」馬房，1914 年開始爲獨立馬主，馬房名稱或沿用其父之「費爾南多先生」，或直接稱爲「可子先生(Mr. G. D. Coutts)」。可子在複式馬房時期有名駒「販子(The Dealer)」，曾從 1900 年秋至 1902 年春，連續四季贏得上海香檳，蔚爲賽馬界傳奇；可子在「費爾南多先生」時期雖然沒有贏得什麼大獎，但馬主、騎師合作無間，其黑上衣配蘇格蘭格子肩帶的服色，是賽馬場上的著名標章。[75]

可子小姐隨母親嫁入可子家族時，年僅 9 歲，在這樣濃郁的賽馬環境下長大，18 歲時便成爲淑女紙獵賽的健將。[76] 同時草地網球、高爾夫球、馬球，基本上只要女性被容許參與的運動，無役不與。[77] 爲了精進騎術，她與麥邊家族的薇拉・麥邊小姐(Miss Vera McBain)等狂熱份子（詳見下節），經常遠赴江灣跑馬場練習大跳欄，被認爲是女性中少數騎術

---

74 "The Death of Mr. G.W. Coutts," *NCH*, 3 October 1890, p. 404; "Stewards and Officials, Shanghai Race Club 1862-1918," in A.W. Olsencomp., *The Racing Record*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8), p. 43A.

75 "Obituary: Mr. G.D. Coutts," *NCH*, 31 December 1926, p. 629.

76 "The Ladies' Paperhunt," *NCH*, 23 February 1918, pp. 463-464; "The Ladies' Paperhunt," *NCH*, 9 March 1918, p. 597.

77 "Ladies' Golf Club," *NCH*, 7 December 1918, p. 623; "Shanghai Polo Club," *NCH*, 21 September 1918, p. 705; "Lawn Tennis," *NCH*, 9 August 1919, p. 372.

圖五　希克林夫人（約 1923 年）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Juel Madsen & Edmund Toeg, 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Sketches and Caricatures* [s.l.:s.n.,1924?], n.p.

堪與男性相提並論者。[78] 男性同儕對其能力之肯定可以由兩件事反映出來，一是淑女紙獵會成立初期，每逢舉賽，多由紙獵會男性成員協助安排路徑，以免發生危險，1926 年春的第三場賽事，則由可子小姐一人決定路線，這是該會史上第一次由女性全權決定者，由此可見男性會員對其之信心。[79] 二是 1922 年丹麥美術家美特生(Juel Madsen)來華，[80] 可能是受上海跑馬總會之邀，與滬上著名馬主都易(H.E. Toeg)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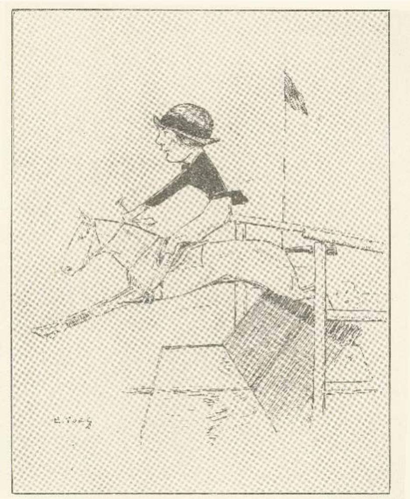
78 "Photo: In Fine Fettle," *The China Press*, 15 March 1925, p. C1.

79 "Ladies' Paper Hunt Club," *NCH*, 23 January 1926, p. 152.

80 "Art Exhibition," *NCH*, 22 April 1922, p. 243;〈美術圖像家蒞滬〉，《申報》，1922 年 10 月 17 日，第 13 版。

子小都易(Edmund Toeg)，一同以素描與漫畫的形式，繪下滬上著名的馬主與騎師，最後集結成冊，取名《滬上賽馬名人錄》(*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在一片男性的人物中，有三位難得的女性面孔，一爲前述之希克林夫人，一爲下節將提及的惠廉麥邊夫人(Mrs. W.R. McBain)，另一即爲可子小姐。該畫冊中，大部分的圖像都是靜態的、放鬆的，譬如希克林夫人的畫像便是一張面帶微笑的頭部素描（參見圖五），但是可子的是一張動態的漫畫，且出自小都易之手。小都易選擇用可子跳浜時的神情來描繪可子，並以略帶玩笑的筆觸，將其在馬上的堅定與專注，描繪得惟妙惟肖（參見圖六）。

圖六　可子小姐（約 1923 年）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n.p.

從上述幾個女性家族的故事，可以得知殖民社會實爲攀升社會階梯的捷徑，英人一旦來到海外，因殖民者之故，身份本來便驟然提升，如工人階級上升至中產下層、中產下層上升爲中產上層，然後再藉著結婚、再嫁以及子女聯姻等方式，短短兩至三代即可攀升至社會頂層，成爲體面人家。第三代的女性，如可子小姐，即可因此享受到當年如外婆留在曼徹斯特所無法想像的生活，不僅騎馬、養馬，甚至進一步挑戰男性在運動方面專屬權。正因爲可子小姐等來自殖民社會頂層家族，其男性同儕對其常多一分包容與禮讓。換言之，女性之所以能加入獵紙賽實與其社會階級密切相關。

如果說獵紙賽是海外對母國獵狐活動的一種模仿，到了二十世紀初，上海殖民社會中的女性已成功地踏入這個男性專屬的領域，雖然人數有限，雖然戰戰兢兢，但步伐堅定，下一步她們的目標是加入賽馬會、成爲馬主。

## 四、女性馬主

上海賽馬界對於女性的意圖闖入，從一開始的搪塞拖延，到了 1920 年終於做出讓步。進入二十世紀，英國陸續出現獨立的女性馬主，主要爲皇室貴族等上層女性，1920 年 1 月 19 日較爲開明的萬國體育會遂在華人會員的提議下，以此爲由，率先通過邀請女性成爲會員。[81] 該年 2 月，身爲賽馬界龍頭的上海跑馬總會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通過類似條例，讓女性可以透過丈夫或父兄的關係，申請成爲附

[81] "Ladies on the Race Course," *NCH*, 24 January 1920, p. 239.

屬會員。[82] 雖是有限度地開放，但從此女性有機會上場比賽，從一旁鼓掌的觀眾，變成被鼓掌歡呼的對象。

萬國體育會率先通過邀請女性會員，使得華人中出現罕見的女性馬主，首位華人女性馬主當屬萬國體育會創辦人葉子衡之夫人。葉夫人能成立馬房，以自己之名出賽，則與葉家在上海的財富與勢力密切相關。

葉夫人的公公葉澄衷(1840-1899)是上海開埠後，第一批趁勢而起的甬商。葉澄衷出身浙江貧困農家，14 歲隨鄉人來滬謀生，因其「勤懇誠信」而獲西人提攜，遂以五金業起家，之後又獲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獨家代理權，將生意觸角從上海一隅擴及其他通商口岸。在代理美孚煤油期間，由於深諳「物價消長之理，商業操縱之法」之理，葉澄衷將周轉的資金陸續投入錢莊、運輸、地產、絲織、火柴等業，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事業王國。1899 年當他過世時，留下的遺產數目相當驚人，據說共計市值高達六百萬兩。[83]

葉澄衷共有七個兒子，葉子衡（葉貽銓）(1881-?)即爲其第四子。據說他生得「儀表堂堂、爲人豪爽、敢作敢爲」，[84] 少年時在上海讀書，葉澄衷即爲其聘請英國教師，從小深受西洋文化影響。[85] 成年後，愛好養馬、騎馬，欲加入上海跑馬總會不成，乃聯合其他滬上甬商，成立萬國體育會，建立

---

82 “Admit Ladies as Members in Local Race Club,” *The Shanghai Gazette*, 2 February 1920, p. 7.

83 “The Late Mr. YehChing Chong: A Short Sketch,” *NCH*, 3 January 1900, p. 22.

84 酈千明，《葉澄衷傳——從舢板少年到商界巨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頁 187。

85 〈寧波幫庄市籍人士〉，http://zs.zhxww.net/rwzs/rwzs/rwzs_sbgl/20080414145054.htm (2014 年 9 月 22 日).

江灣跑馬場，以國際性總會為號召，會員華洋兼收，從此滬上華人好騎者開始有自己的跑馬場與總會，葉子衡也成為殖民社會公認的「華籍運動家(the Chinese sportsman)」。

葉子衡愛好賽馬，葉夫人也夫唱婦隨，於 1920 年成為滬上第一批女性馬主。葉夫人本姓張，小報有時稱她為「蘭蓀女士」，可能為其名或號。[86] 有關其婚前的情形，我們所知有限，僅知葉子衡的元配本為鄞縣秦氏，後來繼娶鎮海城區施氏，據說施氏容貌姣好，是葉家婦女中最漂亮的一位，但一次夫妻間戲言，施氏言語不慎，辱及婆母，結果引起丈夫厭惡，最後竟從此反目。葉子衡遂納張氏為側室，不久生子謀卓，因為是葉子衡的獨子，母以子貴，遂被扶正為妻。[87] 由於葉子衡行四，小報又稱其為「葉四太太」。[88] 從另一資料，我們得知，葉夫人長於蘇州，可能出身貧困小讀書人家庭，作女孩時即以美貌著稱，因此得以嫁入葉家。當她在葉家地位穩固後，不忘照顧娘家親人，將寡姐及其二子二女一併接來同住，其外甥女鄭香君後來即從葉家出嫁，嫁給漢口太古洋行華經理韋煥章為妻，兩人所生之女即為著名經濟學家顧應昌之妻顧韋澄芬。[89]

葉夫人成為馬主時可能年僅三十出頭，馬廄即稱「葉夫人馬房(Mrs. Yih)」，其馬匹命名頗有個人色彩，多以「鑽石」

---

86 傍花，〈葉四兒媳之黎明跨馬〉，《晶報》，1931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87 鄮千明，《葉澄衷傳》，頁 187。

88 傍花，〈葉四兒媳之黎明跨馬〉，《晶報》，1931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89 〈附錄一：顧韋澄芬小傳〉，劉素芬、莊樹華訪問；向明珠、陳怡如紀錄，《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70、172。

或「大夢」(Diamond)結尾，前面再加上顏色。譬如，1923年萬國體育會競賣時，該馬房便有白羅大夢(Blue Diamond)、格林大夢(Green Diamond)、挪白而大夢(Noble Diamond)、白浪大夢(Brown Diamond)、惠特司東(White Stone)等五匹參加競賣，頗具規模。[90] 1926 年中國賽馬會成立後，為打響知名度，以高額獎金創辦「金尊賽」，做為該賽馬會之經典大賽，規定除馬匹必須為當年新馬外，馬主還必須連勝兩年才能擁有金尊獎盃，上海賽馬界遂競相派出當年最好的新馬，以一決雌雄。1927 年 12 月第二次金尊賽，葉夫人即以江灣搖會馬「惠特大夢色根(White Diamond II)」贏得比賽，騎師為西人老將海馬惟去；[91] 1928 年 12 月第三次金尊賽，葉夫人以名駒「印地崑(Indian Corn)」上場，騎師為華人老將李大星，結果不幸飲恨，僅得第三，未能順利取得金尊獎盃。[92]

如果說葉夫人代表第一批華人女性馬主，西人的首位女性馬主應該是海因姆夫人(Mrs. Ellis Hayim, ?-1966)。海因姆夫人閨名芙羅拉．伊萊亞斯(Flora Kate Ellias)，又名咪咪(Mimi)，她是上海猶太家族伊萊亞斯家的長女。滬上源自巴格達的猶太家族多藉聯姻建立複雜綿密的人際網絡，咪咪的婚姻即是如此，1918 年她嫁給滬上另一猶太家族的海因姆(Ellis Hayim, 1894-1977)為妻。海因姆 1894 年生於巴格達，先後在孟買與倫敦接受教育，1911 年始抵滬，他的母親是沙遜家的小姐，和咪咪結婚後，更與伊萊亞斯家聯姻，拜家族人脈

90 〈萬國體育會競賣記（三）（續）〉，《申報》，1923 年 2 月 11 日，第 14 版。

91 〈中國金尊賽〉，《競樂畫報》，卷 1 期 7（1935 年 12 月 7 日），頁 5。

92 "Chinese Jockey Club," *NCH*, 8 December 1928, p. 409.

與自身能力，1924 年時已是利安洋行(Benjamin & Potts)的合夥人，該行不僅經營證券、股票、匯票等業務，更資助許多推動上海發展的重要計劃，因此被稱為「遠東最顯赫的股票經紀公司與財政代理人」。[93] 咪咪的娘家兄弟均熱衷賽馬，丈夫海因姆亦熱愛騎術，咪咪本人雖不好騎，但 1920 年 2 月上海跑馬總會甫通過接受女性會員，她隨即加入，並於該年春賽第二日以康米定金(Comedy King)贏得專為新馬舉辦的上海達比大賽(Shanghai Derby)，當身材高大的咪咪虎虎生風地拉馬走過大看臺時，馬上的騎師乃至兩旁鼓掌的馬主都意識到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參見圖七）。[94]

除了葉夫人、咪咪之外，惠廉麥邊夫人是另一積極參與賽馬的女性，她出身於滬上著名的麥邊家族，此一家族的起伏見證了殖民社會早期女性奮鬥的過程。惠廉麥邊夫人的公公老麥邊(George McBain, 1847?-1904) 1870 年代即來華，以經營長江輪船航運起家，1890 年代又因投資蘇門答臘北部的煙草種植，進而參與當地的火油開採。到了 1890 年代，老麥邊已是上海重要商人，多次當選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在外人社群中深受敬重。1904 年老麥邊因支氣管炎引發其他併發症意外過世，年僅 57 歲。《北華捷報》用相當強烈的字眼為之惋惜，稱之為「母國送來遠東品質最好的人」，其過世

93 “Hayim, Ellis,” S. Ezekiel comp., *Leaders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hought in China* (Shanghai: Geo.T. Lloyd, 1924), p. 169; “Hayim, Ellis,” George F. Nellist,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A Standard Biographical Reference Work*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33), pp. 164-165；〈利安洋行〉，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357。

94 “The Spring Races,” *The Shanghai Times*, 5 May 1920, p. 3; “Photo: Mimi Hayim Leading in Comedy King,” Coates, *China Races*, p. 159.

是「對上海以及遠東外人社群的一大打擊」。[95]

圖七　1920 年 2 月海因姆夫人贏得上海達比大賽後拉馬走過大看台

資料來源：Austin Coates, *China Ra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9.

老麥邊爲家族事業打下基礎，但守住事業並讓其進一步擴張的則是其夫人西西爾(Mrs. Cecile Marie McBain, 1869?-1924)。如同當時大多數來華外人一般，老麥邊早年用心於事業，直至年近四十才步入婚姻，1887 年 12 月他在新加坡迎娶年僅十八的西西爾(Cecile Marie (May) Russich)。[96] 關於其

---

95 "The Death of Mr. George McBain," *NCH*, 18 February 1904, pp. 338-339;〈麥邊洋行〉，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頁 326-327。

96 "Marriage," *NCH*, 20 January 1888, p. 53; "Deaths: McBain," *NCH*, 23 August 1924, p. 320.

夫人的血統來歷說法不一，有的說是船家女兒，有的說是流落寧波街頭的孤兒，不論如何，應是歐亞混血兒無疑，其後人也說她是奧地利與華人的混血。[97] 年輕的西西爾嫁給老麥邊一年後，長女出生，接著幾乎每隔一年一個小孩，到 1904 年老麥邊過世時，共有五子四女之多。[98] 兒女雖成群，但不是年僅十餘歲的少年，就是尚在稚齡的幼童，無法擔起老麥邊在公司的職務。爲了維護家族事業，麥邊夫人做了一個不尋常的決定，1906 年 6 月她決定下嫁與其夫友善且熟悉公司業務的弗里曼(R.S. Freeman)，後者同意冠上麥邊姓氏，將姓名更改爲馬克拜(R.S. FreemanMcBain，或稱R.S.F. McBain)，成爲麥邊洋行主人。在這樣的安排下，麥邊夫人成功地保全了家族利益，並與具騎士精神的馬克拜聯手進一步擴張事業版圖。[99]

兩人從 1906 至 1925 年主掌家族事業近二十年，期間除了長江輪運以及蘇門答臘煤油事業蒸蒸日上外，麥邊洋行進一步跨足滬上房地產業與華北煤礦開採。1904 年麥邊夫人率先在公共租界西面靜安寺路、戈登路、愛文義路之間建立起廣達六十畝的麥邊花園；1913 年又在外灘一號建立樓高七層

97 York Lo, "From No 1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to a Kaolin Mine in Cha Kwo Ling, Hong Kong – the Century Old China Coast Saga of the McBains," http://industrialhistoryhk.org/from-no-1-on-the-bund-in-shanghai-to-kaolin-mine-in-cha-kwo-ling-the-century-old-china-coast-saga-of-the-mcbains/#_edn9（2017 年 5 月 3 日）.

98 York Lo, "From No 1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to a Kaolin Mine in Cha Kwo Ling, Hong Kong".

99 "Marriage: McBain-McBain," *NCH*, 7 September 1906, p. 595; "H.M. Supreme Court: M.M. Tackey v. R.S.F. McBain," *NCH*, 23 October 1909, pp. 187-209.

的麥邊大樓(the McBain building)。麥邊花園於 1922 年底轉售上海飯店公司，改建爲著名的大華飯店；麥邊大樓則於 1917 年轉售予亞細亞火油公司，作爲該行在華總部，後稱「亞細亞大樓」。[100] 麥邊夫人用心於地產投資，馬克拜則跨足華北煤礦業。1918 年馬克拜以麥邊洋行主人身份發起開辦上海興利墾殖公司(Shanghai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Co., Ltd.)，投資經營華北門頭溝煤礦。[101] 同年，又與祥茂洋行主人伯基爾(A. W Burkill)及匯通洋行董事惠而司(A. J. Welch)等共同發起開辦上海銀公司(Shanghai Loan & Investment Co., Ltd.)，經營放款融資。[102] 1924 年麥邊夫人過世時，她與馬克拜已爲其五子四女建立起一個橫跨航運、礦產、金融以及房地產開發的事業王國。

身爲滬上重要洋行行東，老麥邊與馬克拜均擁有馬房。[103] 耳濡目染之下，麥邊家的女眷也不讓鬚眉，次女薇拉與三女黛西均善騎，尤其活躍於獵紙賽。薇拉．麥邊年紀較長，1918 年即爲淑女獵紙賽健將，爲了精進騎術，她與前述之可子小姐，經常遠赴江灣練習大跳浜，同爲滬上第一批熱衷馬術的女性；[104] 妹妹黛西年紀較輕，1926 年才開始參加獵紙賽，

---

100 “Shanghai Hotels’ New Scheme,” *NCH*, 4 November 1922, p. 299;〈亞細亞大樓〉，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525-526。

101 〈上海興利墾殖公司〉，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頁 48。

102 〈上海銀公司〉，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頁 54。

103 〈春賽二志〉，《申報》，1893 年 5 月 4 日，第 3-4 版；〈春賽三誌〉，《申報》，1893 年 5 月 5 日，第 3 版；“Local and General News,” *NCH*, 20 May 1910, p. 420.

104 “The Ladies’ Paperhunt,” *NCH*, 23 February 1918, pp. 463-464; “The Ladies’ Paperhunt,” *NCH*, 9 March 1918, p. 597.

但她擅長側騎，越澗跳浜毫不退縮。[105] 薇拉與黛西最小的弟弟小麥邊(E.B. McBain)更是滬上著名騎師，20 歲（1916 年）時即開始爲自家及他人馬房出賽，從該年起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人關入拘留營止，他一直是上海賽馬界的健將，被認爲是二十世紀初繼約翰斯東、小白克而、思九(R.F. Stewart)、海而(W. Hill)等人之後，上海第二批優秀騎師。[106]

惠廉麥邊夫人即爲老麥邊次子惠廉(William R.B. McBain, 1891-1971)之妻，她亦名薇拉，是倫敦一位戴維斯少校(Major Davis)之女，從其娘家地址倫敦聖詹姆士庭院 289 號(289 St James Court, London)看來，家境應該相當不錯。[107] 歐戰末期她與時在歐洲參戰的惠廉在倫敦成婚，戰爭結束後隨夫一同返回上海，適逢萬國體育會及上海跑馬總會相繼對女性開放，遂成爲上海第一批獨立女性馬主。馬房名「惠廉麥邊夫人(Mrs. William McBain)」，1920 年甫登場便一鳴驚人，在該年的江灣達比大賽(Kiangwan Derby)中奪冠，1923 年她與前述賽馬世家的可子小姐結爲密友，[108] 進而共組「我們倆馬房(We Two)」。[109] 該馬房縱橫上海、江灣、引翔等馬場，成績驚人。以賽馬界最高榮譽的大香檳賽爲例，截至 1933 年止，其記錄已包括一個上海跑馬廳冠軍、一個引翔跑馬

---

105 "Photo: Miss D. McBain, Winner of the Side Saddle in Second Meet," *NCH*, 6 March 1926, p. 457.

106 "Racing on Decline," *NCH*, 7 October 1936, p. 27; "The Kiangwan Races," *The Shanghai Times*, 27 November 1916, p. 8;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A]: Shandy Press, 2006), pp. 580, 605.

107 "Marriages: McBain-Davis," *NCH*, 3 August 1918, p. 307.

108 "The Escape from Dzushi," *NCH*, 15 September 1923, pp. 760-761.

109 "Shanghai Spring Race Meeting," *NCH*, 12 May 1923, p. 397.

廳季軍，以及兩個上海跑馬廳殿軍，是滬上動見觀瞻的重要馬房。[110] 更重要的是，惠廉麥邊夫人不僅是馬主，也是賽馬界出色的女主人以及上海時尚帶領者。早在 1923 年丹麥美術家美特生為其素描時，便將她描繪成一位穿著時尚的年輕少婦，略帶嬌羞，是一片陽剛的賽馬場當中，少數的柔美（參見圖八）。進入 1930 年代，滬上著名馬主老沙遜(D.E. Sassoon, 1866-1938)由於終身未婚，無論在春秋大賽開賽前舉行餐會、或者勝出時需要女伴一同拉馬走過大看臺之時，多邀惠廉麥邊夫人同行，惠廉麥邊夫人在這些場合，也

圖八、惠廉麥邊夫人（1923 年）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n.p.

---

110 "Lady Race Pony Owners," *NCH*, 10 May 1933, p. 239.

每每裝扮入時，周旋合宜，恰當地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以致《北華捷報》婦女專欄「茶餘漫談(Over the Tea Cup)」稱讚她與時已改稱小立達爾夫人的可子小姐，同爲女性能結合賽馬知識與服裝品味的最佳例證。[111]

賽馬界的大門既開，獵紙賽健將可子小姐自然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其馬房先以「可子小姐」爲名，1923 年又與柔美的惠廉麥邊夫人共組意味深長的「我們倆馬房」，縱橫上海、江灣、引翔等馬場，1927 年可子小姐下嫁平和洋行的小立達爾(J. H. Liddell)爲妻，馬房名更改爲「小立達爾夫人」。[112] 進入 1930 年代，小立達爾夫人在賽馬界地位愈顯重要，其夫家黎德爾家族與其娘家一般，同爲滬上賽馬世家，她自己又繼希克林夫人出任淑女獵紙賽會長(1928-29)。更重要的是，小立達爾夫人與其他賽馬界的女性不同，她不僅是馬主，還親自參與訓練，據說每天早上至少騎練五匹駿馬，年紀雖輕，在賽馬界卻被視爲老手。[113] 1935 年 11 月 7 日上海秋賽第三天舉行香檳大賽，會員看臺上三位重量級人物站在一起一面觀賽、一面品評賽事，一位是跑馬總會總董伯基爾、一位是跑馬總會的董事兼執事雷莫相(W. R. Lemarchand)，還有一位身穿皮裘的年輕女子，此人無他，正是小立達爾夫人，《北華捷報》稱他們爲「賽馬界三位最著名的人物」。[114]

賽馬對小立達爾夫人而言，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愛

111 “Over the Tea Cup,” *NCH*, 10 May 1932, p. 239; “Photo: Still King of Local Turf,” *NCH*, 11 May 1938, p. 245.

112 “Weddings: Coutts-Liddell,” *NCH*, 26 November 1927, p. 365.

113 “Lady Race Pony Owners,” *NCH*, 10 May 1933, p. 239.

114 “Photos: Champions Day Scenes at the Race Course,” *NCH*, 15 November 1933, p. 268.

好，也是生活的意義與目標，其重要性似乎更勝於婚姻。1937 年 2 月與她極爲親近的弟弟小可子(George Rogerson Coutts)在上海過世，她頓失依靠。[115] 1939 年她的長期忽略家庭終於導致她與小立達爾的婚姻破裂，該年 4 月男方以遺棄爲由，向英國在華最高法院訴請離婚，該年 12 月獲准。[116] 但這一連串的挫折與打擊似乎對她而言都不重要，她將精神完全投注於賽馬與獵紙。[117] 事實上，1937 至 1940 年正是她賽馬生涯的高峰，1937 年 12 月上海跑馬總會舉行聖誕節大賽，小立達爾夫人馬房的馬匹同時贏得第五場賽事的冠軍與亞軍，創賽會記錄；[118] 1939 年 5 月上海春賽，該馬房進而以「雨水(Rain)」擊敗強敵，勇奪香檳大賽；[119] 同年 11 月，她與麥邊夫人共同擁有的我們倆馬房又以良駒「嘉年華會(Carnival)」贏得上海跑馬廳的「愛爾文跳欄賽(The Irwell Handicap)」，兩人雙雙拉馬走過大看臺（參見圖九）。小立達爾夫人在賽馬方面春風得意，在獵紙賽亦復如是，她先於 1939 年 12 月的男女混合賽中，以「慢慢來(Going Slow)」

---

115 "Deaths: Coutts," *NCH*, 17 February 1937, p. 308; "Obituary: Mr. George R. Coutts," *NCH*, 17 February 1937, p. 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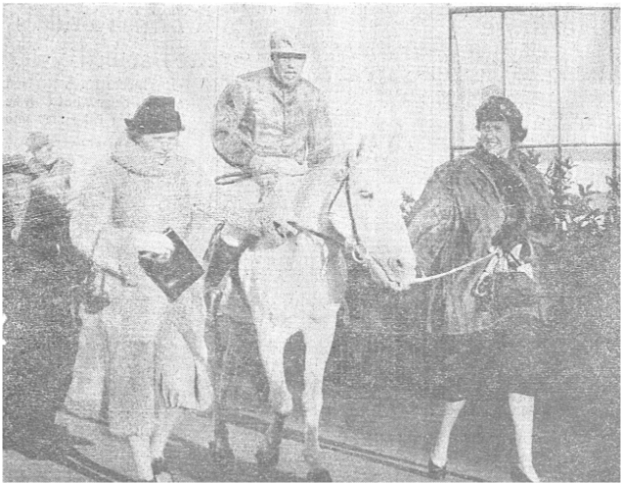
116 "Divorce Suit: J.H. Liddell v. Mrs. G.M. Liddell," *NCH*, 5 April 1939, p. 31; "Decrees Absolute," *NCH*, 13 December 1939, p. 461.

117 離婚後，可子依照當時英國的習慣，沿用立達爾的姓氏，但在名字部分改回閨名，以比利・小立達爾夫人(Mrs. Grace Mary Liddell 或 Mrs. Billie Liddell)之名，繼續活躍賽馬界。參見："Christmas Hunt," *NCH*, 3 January 1940, p. 16.

118 "Photo: First and Second to Same Owner," *NCH*, 29 December 1937, p. 504.

119 "Rain Wins Champions," *NCH*, 17 May 1939, pp. 294-295; "Photo: Worthy Winner of the Champions," *NCH*, 17 May 1939, p. 294.

圖九 1939 年 11 月 25 日麥邊夫人（右）與小立達爾夫人（左）拉馬走過大看臺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Photo: Proud Winner of the Irwell Handicap,"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6 Nov. 1939, p. 5.

擊敗眾男性好手，贏得冠軍；[120] 又於次年 2 月獵紙會的年度大賽，以同一匹馬贏得賽事最高榮譽「挑戰盃(Challenge Cup)」，再次證明她在馬場上的能力。[121] 賽事均由上海獵紙會會長親自安排與主持，而獵紙會會長無他，正是甫與小立達爾夫人離異的小立達爾先生。歷經離婚官司的痛苦煎熬，雙方卻若無其事地並轡共騎；更令人驚訝的是，賽馬界人士對此也保持低調，大家對小立達爾夫人不愛婚姻、愛駿馬的行爲，不以爲忤，充分展現殖民社會上層對其內部成員

120 "Ladies' Dominate 2nd Hunt," *NCH*, 13 December 1939, p. 458.

121 "Going Slow Wins Challenge Cup," *NCH*, 21 February 1940, p. 301.

驚人的包容力。

小立達爾夫人對賽馬的熱情超出一切，不僅喪親、婚變無法遏止，甚至戰爭、國共易幟也難以改變。在滬時期，小立達爾夫人已是賽馬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二戰結束之後，她轉往香港，更成爲殖民地的傳奇。據說她每天早上八時準時至快活谷練馬，風雨無阻，從馬夫到馬主，大家對她無人不知、無人不曉，55 歲時還在晨練時從狂奔的馬匹摔下，斷了三根肋骨。小立達爾夫人在港時期馬房馬匹的數量雖然不多，一般僅一至二匹，但因她浸淫賽馬界超過半個世紀，善於識馬、練馬，所以屢有勝出。她 67 歲那年《南華早報》稱她爲快活谷的同義詞，並說賽馬場上沒有她便不完整。[122] 小立達爾夫人對賽馬的熱情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刻，1974 年 12 月 7 日她逝於香港，享年 73 歲，過世當天還以勝出馬主的身份牽馬走過大看臺。[123] 她過世之後，香港賽馬會爲這位老大姐在聖公會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舉行盛大喪禮，賽馬會董事爲之護柩，賽馬會的馬夫、馬主、騎師坐滿教堂，賽馬會總董致詞時稱小立達爾夫人爲快活谷的「老大姐(Grand Old Lady)」，其不屈不撓的個性有如一匹眞正的「英國純種馬」。[124]

1920 年滬上賽馬會的相繼開放，使得葉夫人、海因姆夫人、惠廉麥邊夫人、小立達爾夫人等因此成爲滬上第一批獨

---

[122] “Mrs Liddell Is Injured in Riding Accid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ereafter *SCMP*), 24 November 1955, p. 3; “Turf Profiles 4,” *SCMP*, 16 February 1967, p. 3.

[123] “Top Racing Personality Dies,” *SCMP*, 9 December 1974, p. 1.

[124] “Farewell to the Valley’s ‘Grand Old Lady’,” *SCMP*, 12 December 1974, p. 7.

立的女性馬主，但新政策對女性會員其實有諸多限制。首先女性不被視爲正式會員，所以其入會過程與男性不同，既無須投票，亦不必付入會費，只需男性親屬提名，董事同意即可。入會後，此一身份亦僅供其擁有馬匹並參與馬會所舉行之比賽，既無權像男性會員一樣享受會所設施，亦無法以此展示身份地位。最嚴格之處還在於此一身份係以婚姻關係爲主軸，亦即女性婚前尚可由其父兄提名，一旦結婚，就必須改由其丈夫重新提名；如其所嫁之人不是會員，則即便其父兄爲會員，該女性亦不具成爲附屬會員之資格；如其夫因暫時離滬成爲缺席會員，亦即保持會籍，但不繳納年費亦不出賽，其妻即便仍在滬上，亦無出賽之權；無論提名者是父兄還是丈夫，只要提名人停止爲會員，女性的會員身份亦隨之告終。作爲男性會員的附屬品，女性甚至無權自行繳納年費，必須透過提名人代爲支付，提名人在提名時也必需立約保證他將負責女性會員在會中的一切開支。[125] 在此重重限制下，馬主中不僅西人女性數量有限，華人女性馬主更寥寥可數，除萬國體育會創辦人葉子衡之夫人外，僅出身南潯四象張家的張叔馴夫人是其中異數。[126] 但是 1927 年賽狗的引入，爲殖民社會的中上層女性開啓了另一扇通往英式狩獵活動的大門。

---

125 *Rules of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pp. 6-7.

126 "List of Winning Owners and Amount of Stakes won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zepoo during 1929," *The Racing Record (Form at a Glance): A Complete Record of Racing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szepoo for 1929*, vol. XII (Shanghai: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p. 114.

## 五、賽狗主人

與賽馬或獵狐相較，賽狗其實是非常晚才發明的遊戲，它之所以被視爲一種「運動」，主要是因爲它與英國傳統的「獵犬逐兔賽(coursing)」關係密切，甚至可說是後者的大眾版。

賽狗所使用的獵犬是一種特殊的狗種，腰細腿長，型態優雅高貴，中文有時翻譯成靈猩(greyhound)，其特色在於以視覺而非嗅覺狩獵。早在中世紀薩克遜及諾曼人時期，英國便有著攜靈猩狩獵的習慣，惟只盛行於少數地主及貴族之間。十六世紀，地主貴族階級間開始出現「獵犬逐兔」的比賽，並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後蔚爲風潮；最初先是少數的俱樂部私下進行，但到了 1831 年狩獵法(Game Law)正式通過後，開放性的賽事與日俱增。比賽辦法是先縱兔於前，再放靈猩追逐於後，裁判騎馬緊隨；因野兔奔走方向不定，靈猩必須在群犬中奔走跳躍保持優勢，因此除速度是評審要件外，靈猩的獵殺技巧與靈敏度更是取分關鍵。[127]

獵犬逐兔與狩獵間關係密切，是鄉紳等上層階級之間的休閒活動，所以自始即被視爲一項運動，並常與賽馬相提並論。十九世紀下半葉，獵犬逐兔已成爲常規性的比賽，賽季自每年九月始，次年三月終。例如，曾任香港怡和洋行大班的英國國會議員加律治(Sir Robert Jardine)縱橫於英國各大馬賽盛事間，1869 年曾以粟色雄駒「僭王(Pretender)」在著名的達比(Derby)賽馬會中奪魁，但眞正讓他得意的卻是四年

[127] "Coursing", Athelstan Ridgway ed., *Everyman's Encyclopedia*, Third Edition, vol. 4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1950), pp. 310-311.

後以靈猩「妙麗兒(Muriel)」拿下獵犬逐兔賽的最高榮譽——滑鐵盧杯(Waterloo Cup)，顯示獵犬的珍貴與重要性絕不下於駿馬。[128]

獵犬逐兔的比賽雖然刺激，但終究是少數人的享樂，要能吸引一般大眾，達到充分參與的目的，恐怕必須去除那些技巧、角度、靈敏度等模糊的裁判空間，同時有固定的場地、足夠的視野與光線，最好還能控制獵犬行進的方向。1922 年前後，在美國出現以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賽。其比賽以電動假兔為餌，設置於一定的軌道上滑行，一旁則派專人控制速度；假兔先繞場一周，然後放出靈猩，靈猩藉視線而非嗅覺追逐獵物，在專人操作下，靈猩縱使全力奔馳，對假兔卻始終可望而不可及，達到「獵犬逐兔」的目的，然後以先達終點的靈猩為優勝，而觀眾在看臺上全程參與，一目了然。從此，一項嶄新的大眾娛樂就此展開，名為「賽狗」。1925 年，這項活動經美國人芒恩(C.A. Munn)率先引入素有獵犬逐兔傳統的英國，立刻引起轟動，一時賽犬蔚為風潮，各大城市諸如倫敦、伯明罕、愛丁堡、里茲(Leeds)、普里茅斯、列斯特(Leicester)、布來頓(Brighton)、加地夫(Cardiff)等地紛紛跟進，[129] 據說當時不少英國足球場還因此改為賽犬場。[130]

跑狗在英國掀起的熱潮很快便受到上海英僑的注意，最先將之引入者無他，正是惠廉麥邊夫人的先生惠廉麥邊以及咪咪的丈夫海因姆等上海跑馬總會成員。1927 年賽狗引入上

---

128 Robert Blake,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pp. 150-151.

129 "Greyhound Racing in Shanghai," *NCH*, 14 January 1928, p. 54.

130 〈記上海賽犬場〉，《晶報》，1928 年 2 月 12 日，第 2 版。

海後，隨即掀起狂潮，短短一年的時間，滬上相繼成立明園(Luna Park)、申園(The Stadium)、逸園(Canidrome)三家跑狗場，並以低廉的票價向滬上大眾招手，從而掀起是賭博還是運動的論戰。反對者以爲跑狗場一元即可下注，是引誘華人賭博，支持者則主張，賽狗源自獵犬逐兔賽，是英國狩獵文化的一部份，是不折不扣的運動。[131] 不管論戰如何，對女性而言，賽狗此一活動進一步打開了狩獵世界的大門。

賽狗在英國初起時，即特別引起女性青睞，不僅前往觀賽者，有四成是女性，也有不少女性踴躍出任獵犬主人，其階層除貴族婦女外，還包括著名騎師的女兒、政治人物的妻子、音樂劇的女演員等。一位前來觀看賽事的婦女甚至認爲，賽馬向來被稱爲「國王們的運動(the sport of kings)」，賽狗應可被稱爲「王后們的運動(the sport of queens)」。女性之所以特別喜愛賽狗，究其原因，一般認爲賽狗以電動假兔代替眞的兔子，避免了四分五裂的血腥場面，女性比較容易接受，同時獵犬也比馬匹更友善、更不具威脅性，也因此更適合女性。[132] 不論此說是否成立，賽狗引入上海後，確實深受中上層女性的青睞，主要原因在於賽狗總會對性別限制的鬆綁。賽狗仿效賽馬，採取總會制，三園各自招收會員，以出任獵狗主人，參加競賽。明園沿襲跑馬總會的規定，允許會員的女性親屬成爲附屬會員，但規定已略有鬆動，申園

131 有關此一論戰，詳見：張寧，〈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2（2003 年 12 月），頁 73-124。

132 A.R.D. Cardew, *All about Greyhound Racing* (London: Mathews & Marrot, 1928), pp. 25-26.

更直接向華人女性招手。[133] 兩會雖仍須男性代爲提名，但限制既少，租用獵犬費用又相對低廉，足以負擔，頓時吸引滬上中西女性加入，西人女性主要加入明園，華人女性則以申園爲優先。至於後起之秀逸園，也在徵求會員時規定，凡創始會員之妻子與兒女，只要到達法定年齡，均可不經審查即成爲會員。[134] 於是在三個賽狗總會的推波助瀾下，賽狗在滬上中上層女性颳起一陣旋風，原先已是馬主者，如惠廉麥邊夫人、海因姆夫人、小立達爾夫人、葉子衡夫人、張叔馴夫人，以及前年剛在金尊賽中奪冠的勞愛德女士(Miss Ada Law)等，自然踴躍加入；原先不是馬主，但父兄或丈夫是馬主者，也趁此出任獵狗主人，一享場上的榮耀。譬如，已故匯豐銀行經理斯蒂芬(A.G. Stephen)一對活躍於上海社交圈的孿生女馬歌特(Margot)與蒂納(Tina)，便以「快樂罪人(Merry Sinner)」與「快活跑(Merry Go Round)」兩隻獵犬在明園賽事中屢屢奪魁。[135]

申園成立時，葉夫人已是賽馬界的重要人物，其夫葉子衡爲滬上公認的華籍「運動家」，其子葉謀卓（葉謀焯、葉謀倬、葉康南）爲江灣騎師，媳婦葉顧瑤娟女士則爲蘇州名媛，時髦新潮，特立獨行。[136] 婆媳二人遂相偕加入申園，

---

133 〈廣告：申園賽狗場啓事三〉，《申報》，1928 年 7 月 3 日，第 1 版。

134 "Ad.: Champ de Courses Francais," *The China Press*, 13 August 1928, p. 9.

135 "Thrilling Scenes at Luna Park", *NCH*, 2 June 1928, p. 383; "Greyhound Racing at Luna Park", *NCH*, 30 June 1928, p. 558; "Obituary: Mr. A.G. Stephen", *NCH*, 6 September 1924, p. 382; "Big Society Wedding," *NCH*, 11 November 1930, p. 194; "Wedding: Stephen-Storich,"*NCH*, 24 March 1931, p. 398.

136 片羽自滬寄稿，〈葉四婚訟庭訊記〉，《大光明》，1930 年 10 月 28

賽前舉行獵犬抽籤時，婆婆抽中「福利發律(Folly Free)」，媳婦抽中「沙蘭勞(Solario)」。1928 月 7 月 31 日申園開幕，晚上九時起開始比賽，中西觀眾，超過萬人，車水馬龍，盛極一時。當日共賽七次，第一場拔得頭籌的正是媳婦名下的獵犬沙蘭勞，獵狗主人除獲得獎金銀百元外，還有開幕銀杯一座，花籃多只，此外並有籐筐一隻，中盛剛出生的乳犬一頭。葉卓謀夫人雖是申園第一位得獎的獵狗主人，但因當時她遠赴大連，不在現場，所有榮耀乃由其婆婆葉子衡夫人代為享受，當葉子衡夫人牽著沙蘭勞上臺領獎時，「一時歡賀之聲，有如雷動，蓋咸為葉夫人慶幸也」。[137]

除了賽馬界人士，賽狗也吸引不少一些原先鮮少涉足賽馬的女性加入。申園獵狗主人聶其璧便是其中之一。聶其璧是 1890 至 1894 年蘇松太道聶緝槼最小的女兒，也是上海總商會會長聶雲台的小妹，據說從小聰明伶俐，膽大包天，因為就讀於教會學校，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也交了不少洋朋友。1923 年，她與當時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教授的周仁結婚時，擔任其儐相的正是尚在閨閣中的宋美齡。聶其璧後來還曾一個人獨闖西方，遊歷了大半個歐洲回來，是家族中的傳奇人物。[138] 這樣的個性，正適合參與賽狗這種新發明的活

---

日，第 2 版；良夫自海上寄，〈葉四婚訟庭訊再記〉，《大光明》，1930 年 11 月 17 日，第 2 版；汩汩，〈葉四夢蘭有兆〉，《大光明》，193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葉顧瑤娟女士〉，《大光明》，1931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三三，〈前進〉，《大光明》，1932 年 1 月 1 日，第 4 版。

137 〈申園昨日舉行開幕禮〉，《申報》，1928 年 8 月 1 日，第 15 版；"Opening of New Greyhound Track Attended by Crowd of Twelve Thousand Fans," *The China Press*, 1 August 1928, pp. 5, 7.

138 宋路霞，《上海的豪門舊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 106、

動。除聶小姐之外，其他參與賽狗的女性還包括：上海新華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黃明道的夫人、絲業巨子楊信之的孫媳楊成一夫人、被工商部聘為工商設計委員會委員潘銘新的夫人，以及盛小姐、馮小姐、董夫人、杜夫人等多位一時無法辨識的女性。[139] 更令人驚奇的是，許多人往往參加不止一個總會。例如，1929 年 10 月 25 日晚上十點，一位家住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園坊 36 號的張夫人，在逸園跑狗場的會員休息室掉了一個錢包，裡面除了金質香菸匣、火柴匣、手帕、粉盒、梳子、金幣、印章、綠石髓寶石、保險箱鑰匙等之外，還有明園、申園、逸園三個跑狗場的會員徽章。張夫人在英文《大陸報》上刊登廣告，表示凡拾獲並歸還者，願出一百元作為酬勞。[140] 三個會員徽章，意味者張夫人可以每晚自由出入跑狗場的會員看臺、招待朋友、使用會員休息室，同時出任獵狗主人，享受勝出時眾人的目光與掌聲。張夫人的案例顯示了賽狗對女界的特殊吸引力，對上海中上層華人女性而言，此時白日進行的賽馬活動已稍嫌正式與嚴肅，夜間進行的賽狗是一種更現代、更活潑、更自由的活動，更適合她們享受越夜越美麗的城市生活。

在賽狗場上，她們不僅是獵犬主人，也不僅是觀眾，一些名媛更可能是頒獎人。1935 年 12 月 21 日逸園跑狗場舉行眾所矚目的幼犬賽(The Puppy Stakes)，結果由雷卡夫人(Mrs.

109-110。

139 〈申園二次搖會狗抽籤記〉，《申報》，1928 年 7 月 23 日，第 15-16 版；〈賽狗消息〉，《競樂畫報》，卷 2 期 4（1936 年 1 月 25 日），頁 16。

140 “Ad.: Reward for Recovery of Lost Articles,” *The China Press*, 30 October 1929, p. 17.

L.H. Richards)的牝犬「波司特台(Bowster Day)」險勝大家看好的「取利卜路福司(Chihli Blue Fox)」，贏得第一。逸園當局即邀請年輕優雅的馬女士代表頒發獎盃與獎金。從圖十可以看到身著皮裘的馬女士手持皮包，長身玉立，站在左邊，冠軍得主雷卡夫人手捧銀杯立於中間，最右則爲怏怏不樂的亞軍得主，單就這張照片爲例，撇開訓練師不算，從得獎人到頒獎人，均以女性佔多數，賽狗場確實是華洋女性特別青睞與活躍的公共空間。

圖十　1935 年 12 月 21 日逸園幼犬賽頒獎後合照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跑狗消息〉，《競樂畫報》，卷 2 期 2（1936 年 1 月 11 日），頁 15。

乍看之下，華洋相較，華人女性似乎較不願意突破體能的限制，擔任狗主、馬主者多，上馬馳騁者少，但是進入 1930 年代，上海中上層華人女性中能騎馬者日多。譬如，前述葉子衡夫人的媳婦葉顧瑤娟便善於騎馬，她經常與其夫葉謀卓

馳騁於上海郊區的大西路上，或出入江灣賽馬場，在葉謀卓勝出時為其拉馬走大看臺。[141] 又如前曾提及的漢口太古洋行華經理韋煥章，他是漢口著名馬主，本身又愛好運動，自小便為子女置有專屬馬匹，其女韋澄芬雖然本性好靜不好動，但因其馬匹十分溫馴，所以還頗喜歡騎馬。[142] 又如，顧維鈞夫人黃蕙蘭女士的姪女嚴小姐(Miss Liane Yen)，她是印尼糖業大王黃仲涵的外孫，從小在歐洲長大，1930 年 12 歲時始返回中國，1936 年嫁給輪船招商局總經理劉鴻生的第三子劉念禮為妻。據說 1934 年秋她與劉念禮在上海初次見面時，便是相約騎馬。[143] 1934 年冬，她在上海紙獵賽中初試啼聲，贏得該季第五次賽的第四名；[144] 次年 2 月又在新年男女混賽中，榮獲第二名。[145] 嚴小姐不僅是上海紙獵賽中的首位華人女性，也是男女混賽中少數幾位名列前茅的女性騎者。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開風氣之先的殖民社會裡，少數華人女性開始上馬馳騁，不是為了殺敵，而是為了展現女性的體能，同時領略自己掌握方向時的樂趣與快感。

---

141 汨汨，〈葉四夢蘭有兆〉，《大光明》，193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落花，〈葉四弔馬記〉，《大光明》，1932 年 4 月 10 日，第 2 版。

142 〈附錄一：顧韋澄芬小傳〉，劉素芬、莊樹華訪問；向明珠、陳怡如紀錄，《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頁 173。

143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2-125; "Young Chinese Couple Wed in London," *The China Press*, 5 February 1936, p. 1.

144 "Hayes Pilots March to Win 5th Paperhunt," *The China Press*, 23 December 1934, p. C1.

145 "Fine New Year Paper Hunt," The Squire, *NCH*, 13 February 1935, p. 267.

## 六、結　語

賽馬、獵狐、獵犬逐兔等運動因源於貴族的狩獵活動，在英國文化中被置於較高的位置，與一般大眾的球戲不可同日而語。受這種價值觀的影響，海外殖民社會無不致力追求，如果環境不允許，便變通進行。以中國通商口岸爲例，無法一直進口純種大馬，就用蒙古小馬替代；不能獵狐，就改爲獵紙；賽狗作爲獵犬逐兔賽大眾化後的版本，引入殖民社會後也大受歡迎。藉由組織這些賽事，殖民社會一方面在海外重新排序社會位階，個人也藉著參與這些運動，而取得證明自己新身份地位的可能性。有趣的是，這種英式價值觀影響的不僅是海外西人，更包括殖民社會中的華人，參與的性別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從不同角度看到運動領域的可利用性。

從本文第三節與第四節的人物故事，特別是可子小姐祖孫三代以及麥邊家族在上海的發展，可以看出，對於滬上西人女性而言，處於帝國邊緣兼多種國籍雜處，其階級流動性遠較母國快速。她們或藉著婚姻、再嫁以及子女聯姻，在短短數代便從社會中下層攀升至上層；或一開始出身不明，因夫而貴，寡居後改以招贅方式掌握經濟大權，開始發揮經營長才，爲家族創造財富。正是在這樣的前人基礎上，身爲第二或第三代的可子小姐、麥邊小姐、惠廉麥邊夫人，才有機會突破男性專屬的運動領域，獲得某種程度的增權。其中，可子小姐的例子尤爲特殊，她在證明自己對馬匹的知識與能力之後，被允許跨出家戶甚至離開家庭，全心做一些原先被認爲女性不適合的活動，而殖民社會竟對此予以默許，不以

爲忤，由此可見殖民社會對階級內部成員驚人的包容性。

殖民社會爲來華西人創造了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對通商口岸華人而言，租界的介入與存在則讓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社會產生了裂隙，有能力者可藉此突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趁機而起。第四節葉澄衷家族的故事便是個明顯的案例，沒有上海的開埠、沒有新式的五金業與煤油業的傳入，葉家很難在一代當中，便由農村少年躍升爲滬上大賈，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裂隙下，第二代才能順勢加入西人的運動領域，成爲殖民社會中的華人菁英。在華洋男性共同掌握了運動領域之後，華人女性也趁此機會予以利用，她們或擔任運動賽事的頒獎人，以貴婦人的身份對西人騎師溫言獎勵；或擔任勝出馬主的另一半，同享「看與被看」的風光；或成爲獨立馬主或獵犬主人，照片被刊載在報章雜誌之上，爲自己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取得受人尊敬的一席之地。

從本文的論述可以發現，在殖民社會的架構下，一種新的歷史現象正在發生：在運動領域中，女性由旁觀者逐步轉爲主角，從原先看與被看的對象，開始穩坐馬背跳浜越澗。馬背上無人可以倚靠，她必須自己思考、自己判斷，不僅控制自己的坐騎，也控制自己的方向。在一次又一次越野奔馳的過程中，她可能有機會發掘出自我的內在力量，從而培養出對自己的信心；她也有可能找到方法，在不失女性氣質的情況下，盡情地展現自己的能力、體力及技術，並與其他同樣愛好策騎的女性聯手，一同讓女性突破男性專屬的狩獵活動這個行爲，不僅是可接受的(acceptable)，同時也是體面的(respectable)。

狩獵活動無疑成爲女性爭取更多權力的一個場域，若干

女性也確實逐漸在男性主導的運動領域中獲得增權，但必須說明的是，被增權的女性均屬殖民社會上層，亦即男性菁英的妻女或姊妹。在殖民社會中，這些爲數不多的女性確實可以代表某種階級與性別，但一旦脫離這個脈絡，譬如放回華界中國傳統的環境裡，這種代表性很快便被稀釋，並被其他準則所取代。換言之，運動領域中的增權是一個殖民社會才有的特殊現象，此一增權幫助女性在社會地位方面更上一階，但這種文化資本僅在殖民社會中受到肯定，一旦此一華洋雜處的社會因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崩解，即失去意義。不過，殖民社會與殖民社會間顯然有相當程度的繼承，可子小姐（小立達爾夫人）1949 年後縱橫香港馬會的情形，一方面顯示香港賽馬會與上海跑馬總會在人事、法規方面的緊密相連，一方面也可看出上海、香港兩個殖民社會共享的價值觀與繼受關係。

最後一項值得討論的是運動在殖民社會變型的問題，如前所述，爲配合海外環境，英式狩獵活動在華進行了相當的轉變。雖然殖民者的原意並非如此，但此一轉變竟意外造成去血腥化的現象，譬如，以蒙古小馬取代原先的純種大馬，降低了騎者落馬時的危險性；獵紙取代獵狐，由此避免了獵殺狐狸時的暴力，賽狗以電動假兔代替眞兔，更免除賽事最後四分五裂的血腥場面。換言之，狩獵活動中最重要的元素——殺戮(to kill)——因此被抽離，只留下狩獵的形式以及較不重要的競速。這種去血腥化或去暴力化與女性的關係爲何？女性想要參加這些變型的活動是否因爲它們較不血腥？男性容忍女性加入，是否因爲這些活動已經被弱化或淨化，即便女性加入也不違背維多利亞式文化的男尊女卑或男

女差異的刻板印象？將狩獵中最刺激的殺戮保留給男性自己，讓女性去參與去血腥化或去暴力化後的競速，這種想法與作法自然並非全無可能，但筆者以爲不能過於強調。以最符合這種論述的獵紙爲例，女性加入此一活動似乎與血腥與否不直接相關，而與性別有關，亦即渴望突破社會限制，從事與父兄相同的戶外活動。筆者以爲，如果上海的環境允許眞正的獵狐，文中的主角同樣會熱衷參與，以在階級內部突破對性別的束縛。至於殖民社會中的男性，則多從階級的角度考慮此事，只要上層階級的女性能證明自己有足夠的體能與技巧保護自己，不致在狩獵時造成男性的困擾與負擔，最後所獵的是紙片還是狐狸似乎並無明顯差異。

# 徵引書目

## 一、報刊

《大光明》（上海），1929-1932。
《申報》（上海），1872-1949。
《晶報》（上海），1919-1940。
《競樂畫報》（上海），1935-193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Current.
*The China Press*, 1925-1938.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50-1867.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1867-1869.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9.
*The Shanghai Gazette*, 1919-1921.
*The Shanghai Times*, 1914-1921.

## 二、專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中國舊海關史料》。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張緒諤，《亂世風華：20 世紀 40 年代上海生活與娛樂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劉素芬、莊樹華訪問，向明珠、陳怡如紀錄，《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簾外風，《上海大亨杜月笙續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酈千明，《葉澄衷傳——從舢板少年到商界巨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Blake, Robert.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Cardew, A.R.D. *All about Greyhound Racing*. London: Mathews & Marrot, 1928.

Coates, Austin. *China Ra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chran, Sherman, and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Davis, C. Noel. *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 1863-1930*.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0.

Elias, Norbert,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Ezekiel, S. comp. *Leaders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hought in China*. Shanghai: Geo.T. Lloyd, 1924.

Lanning, George.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

Leck, Greg.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A]: Shandy Press, 2006.

Lunt, Carroll comp. *The China Who's Who 1927 (Foreign).* Shanghai: 1927.

Madsen Juel & Edmund Toeg. *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Sketches and Caricatures* [s.l.: s.n., 1924?].

Mangan, J. A.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Aspects of the Diffusion of an Ideal*. London: F. Cass, 1998.

McDevitt, Patrick F. *May the Best Man Win: Sport,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880-193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5.

Nellist, George F.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A Standard Biographical Reference Work*.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33.

Olsen, A.W. comp. *The Racing Record.* Shanghai: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Kelly & Walsh, 1918.

Ridgway, Athelstan ed. *Everyman's Encyclopedia*. Third Edition.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1950.

*Rules of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Shanghai: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Shanghai: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01.

*The Racing Record (Form at a Glance): A Complete Record of Racing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szepoo for 1934*. Vol. XVII. Shanghai: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5.

*The Racing Record (Form at a Glance): A Complete Record of Racing at Shanghai, Kiangwan and Yangtszepoo for 1929*. Vol. XII. Shanghai: The Shanghai Race Club, 1930.

## 三、論文

徐葆潤，〈跑馬廳掠奪國人土地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舊上海的房地產經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169-178。

張寧，〈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2，2003 年 12 月，頁 73-124。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迴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卷 47 期 1，2009 年 3 月，頁 1-126。

Anderson, John L. “Our Horse Races in China.” *Outing*, vol. XVI, no.5, August 1890, pp. 367-371.

Bickers, Robert A. “Shanghailanders: 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1843-1937.” *Past and Present* 159, May 1998, pp. 161-211.

Bourdieu, Pierre.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 6, 1978, pp. 819-840.

Chang, Ning Jennifer. “To See and Be Seen: Horse Racing in Shanghai, 1848-1945.” In Toby Lincoln and Xu Tao eds., *The*

*Habitable City in China: Urban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7, pp. 91-111.

Munkwitz, Erica. "Vixens of Venery: Women, Sport, and Fox-Hunting in Britain, 1860-1914." *Critical Survey*, 24:1, 1 March 2012, pp. 74-87.

Osterhammel, Jürgen.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pp. 290-314.

## 四、會議論文

張寧，〈跳溝越澗：獵紙賽與上海殖民社會〉。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史學科創新團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室主辦，「外僑與近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1 月 29-30 日。

張寧，〈總會、運動與殖民：清末民初之上海跑馬總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15 年 11 月 14 日。

張寧，〈建一個自己的總會：上海萬國體育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跨區域與跨文化的接遇」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2 日。

張寧，〈從萬國到中國：近代上海的中國賽馬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17 年 11 月 30 日。

## 五、網路資訊

〈寧波幫庄市籍人士〉，http://zs.zhxww.net/rwzs/rwzs/rwzs_sbgl/

20080414145054.htm（2014 年 9 月 22 日）.

York Lo, "From No 1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to a Kaolin Mine in Cha Kwo Ling, Hong Kong – the Century Old China Coast Saga of the McBains," http://industrialhistoryhk.org/from-no-1-on-the-bund-in-shanghai-to-kaolin-mine-in-cha-kwo-ling-the-century-old-china-coast-saga-of-the-mcbains/#_edn9（2017 年 5 月 3 日）.

# Sports, Empire and Gender: Women and the Chase in Shanghai, 1860-1945

Ning Jennifer Ch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idea of informal empire and focuses on women in treaty-port Shanghai. Examining three representative British sports or the so-called "chase" at that time—that is, horse racing, paper hunting, and greyhound racing—this article shows that notwithstanding racial differences, British and Chinese elite women in Shanghai faced similar social constraints and adopted the same strategies. By joining the chase as spectators, prize awarders, horse owners, greyhound owners or even actual hunters, they successfully brok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trictions that society imposed on them. This article argues China's treaty ports created a rare fissure for both British and Chinese women. Britain's rigid class system was temporarily broken and re-organized while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hierarchy was disrupted and re-formed. Exploiting this fissure and using sports as a kind of strategy, elite women managed to emerge from their fathers' and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brothers' shadows and gain visibility in public life.

**Key Words: sports, gender, the British Empire, Shanghai**